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学习贯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笔谈

编者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座谈会的重要精神,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围绕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三大体系,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题,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文化属性:基础、学理与实践*

陈冬华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其核心是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累积。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②和二十大报告^③都再次指出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④经济学是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然包含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因此,如何站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度,来学

* 陈冬华,南京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10093。

① 《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本组笔谈以后同。

② 《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本组笔谈以后同。

③ 《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本组笔谈以后同。

④ 《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本组笔谈以后同。

习领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而言,既是迫切的、基础性的重大任务,也是崭新的、难得的珍贵际遇。要在新时代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更大的文化使命,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进一步准确把握自身的文化属性,从基础层面、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加强对这一文化属性的理解、研究和阐释。

一、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植于中华文化

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植于中华文化,具有鲜明而浓烈的中华文化属性,有其理论上的必然性。所谓属性,指内居于自身使其成为所是且无法摆脱者。可以摆脱则不能称为属性。这种属性,无论是否自觉,都始终存在。并且,属性是对其所居对象的一种刻画,一种规定,是所居对象成为自己的主要原因,是所居对象能实现自身目的的主要推动。一个社会必有其赖以形成之文化,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背后必有深厚的人文学科的文化根源与土壤,根深才能叶茂,脱离本土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必然在预测性、解释性和适用性上遇到挑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更加侧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忽略了西方的社会科学根植于西方自身的文化。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就意味着,很多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结论与成果,我们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套用。因此,正确认识并把握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文化属性,是经济学研究经由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进而达至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前提,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经济文明的基础。

何为文化?定义向来繁多,莫衷一是,但大体也有共通之处。柳诒徵在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化史》中认为,文化是“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①钱穆亦提出,“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化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产生”。^②梁漱溟关于文化的解释最为晓白,他认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③因此,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所在,是一个群体关于人生意义的判别,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观念集成。文化经由精神世界的观念塑造,致力于构建出其意欲构建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意欲构建的社会。当然,历史和现实中总是会出现对于“意欲”的偏离,然而这种偏离不会形成观念意义上的传统,唯有群体持久“意欲”之事才能构成正当性并生生不息。

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理世界并无中西分别,^④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而人和社会受到文化在精神层面的观念塑造。个体的社会行动总会受到内在深层文化的导引。因此,中西个人和社会层面并不相同,有重大的差别。^⑤研究对象内在有别,则中西的社会科学自然就难以通适。在这一特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隔,前者当有自身的民族性、继承性和主体性。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深受所在国家民族的文化塑造,则其研究也必然根植在这一文化之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越是发达,越是独特,越是悠久,其根植于此文化的特征就会越发深切著明,中华文化正是上述特点的典型代表。

经济学在西方通常被看作是关于“稀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个人、家庭或者国家政府的财富增进。但是中文里经济学所蕴含的“经世济民”“经邦济世”之意,有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伦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④ 比如物理学、化学等就难有中西之分,自然科学的规律在全球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

⑤ 比如,梁漱溟将西方称之为“个体主义”的社会,而将中国社会根本特征概括为“伦理本位”。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理意味和修齐治平情怀。上述差异之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经济学研究有着不一样的文化所赋予的初心和使命。“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这一经典论述,^①反映了他对实现以普遍富裕为广大效用目标的个体主义出发点,而个体主义正是西方文化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的核心要义。无论是与斯密古典学派有重大不同的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还是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凯恩斯学派,都有着扩展版的边沁式的个体主义影子。因为,个体主义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居其中,无远弗届,难以逃逸。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②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展开根植中华文化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学理建构,新时代呼唤立足中华文化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新国富论,从而确立中华民族的现代经济文明。

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学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建构

经济理论是文化观念在经济活动上的映射,因此,经济活动的成果要在文化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全面、精准的价值衡量。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可行性,取决于后者能否立足前者展开学理建构。脱离学理研究和学术表达,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文化属性就会受到遮蔽,在研究、教育和传播中的作用就会受到抑制,难以达至澄明状态。毫无疑问,学理建构必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西方的经济学研究也经历了数百年的探索,名家如云,灿若星辰,前仆后继,才形成了其今天庞奥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确定“普遍怀疑”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过程中,被誉为世界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笛卡尔曾说:“如果想在科学中建立某种坚定可靠的、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就非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把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③在探索立足中华文化的经济学学理和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构建一个新的体系,还要解构一个旧的体系。解构不是拒绝和排斥,而是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精华。如同宋明儒对佛学“取珠还椟”般,兼具耐心、包容与智慧。在原有的、已经习以为常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合理怀疑,积极创造,逐渐构建起新的自主的学术知识话语体系。这虽是至难之事,但久久为功,终必能实现。

立足中华文化来探索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学理建构,需要重新审视文化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之仅视为经济学的某个分支。目前关于文化和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经济学原理来研究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或精神产品与精神经济),这类研究中,文化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成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而文化的民族精神内核则被抽离了,文化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不再构成研究的重点,因而在学理上难以体现不同文化的特征,体现的更多是文化产业的共性。另一类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将文化所形成的习俗、惯例和价值观作为一种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非正式制度。^④从非正式制度这一称谓可见,^⑤虽然韦伯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归集为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本组笔谈中简称《国富论》,且出版信息相同)第一篇第二章,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② 习近平,202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第16期。

③ 艾伦:《哲学的盛宴》,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

④ North, D. C., 1984, “Transaction Cost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History”,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H), 7—17. Williamson, O. E., 1998,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How It Works; Where It is Headed”, *De Economist*, (146), 23—58.

⑤ 当然“非正式制度”也有我们中文翻译的原因,informal若译为“无形”,可能更为贴切。

新教伦理,将宗教文化提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但这并不影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中,文化只能影响自发的、民间的非正式制度,言下之意,正式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存在。其实,一个国家民族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深受其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新制度经济学似乎有意无意间忽略了。

文化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从来都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正所谓“文以载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经济学研究也是文,焉能不载道呢!^① 经济学是文化在经济领域的一种呈现,一种姿态。行动者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于具体而真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呈现出文化层面的形而上价值。所有的经济学研究其实都是人文经济学,只是人文的特征不一样。西方经济学没有强调其学理建构受到文化的影响,不仅因为其沉浸其中而不自觉之故,也因为其大厦构建于西方在全球实力占优之时,缺少以其他文化作为观照的必要。但是西方经济学主流如此处理文化的影响,恰恰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文化在经济学研究中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也就是说,文化的影响已经透过经济学的学理建构全面精准地得以体现,无须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再新建一个文化的变量。如果文化以在场的方式出现,就可能成为文化经济学或者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文化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就不能统摄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理论‘不讲文化’才可以解释世界。反省我们这样的研究方式,我常常非常情愿、主动地说我们的文化不一样,用文化去解释特定行为模式。我觉得,这恰恰反映了局限性:不能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来讨论”,“要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将社会现象先在文化中建立起来,再把文化从中拿掉,建立一个更高的理论,回过头来,再把文化放进去,就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不放进去,就可以解释其他社会。”^②文化的影响在经济学研究的学理中存在,看似“文化消失”,实则是文化属性在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动摇的内居。

吉登斯(Giddens)提出的具有全球广泛影响的“反身性”(reflexivity),^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怎样影响社会科学的学理建构,但是,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运用金观涛提出的“人文真实”这一概念,^④更加契合中华文化的气质偏好与道德旨趣。“人文的真实性是主体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使他人的观念或过去发生的社会行动可以在主体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科学真实对应着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性,人文真实是主体对社会行动参与或想象参与的受控过程的可重复性,我们称之为可理解性,它不能化约为科学的真实性。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中,两种真实性结构都不可或缺。”中华文化对处于其中的个体产生连续性的影响,其在经济活动上的重演就是经济学上的“人文真实”。这类人类文化心灵建构的真实事项,过去很少得到经济学家的镁光灯。即便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文化的作用强调,也是通过非正式制度这样的概念构造,外在施加约束来加以阐释。这和中华文化中首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由己”“反求诸己”等自我革命式的内在超越有着根本不同。我们当立文化为中,构学理为环,格万事为物,以接应无穷。

推进立足中华文化的经济学研究学理建构,需要回到人的基本范畴,这一点和西方经济学有共通之处。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但是关于人的理解,中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尽管受到有限理性、行为主义的挑战,但西方经济学研究通过经济人假说的预设,牢牢把控了理性的定义权,将经济人等同于理性人。这与中华文化的“缘情入理”“情本体”有着巨大的分歧,因而如果完全套用经济人的假说,中国社会中的很多经济行为面临着巨大的解释困难和指导缺位。徐飞认为,“在讨论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时,人们重点关注资本、劳动、技术、企业家精神、制度这五大要素,文化因素被忽略或未受到充分重视”,“文化是经济发展最深层次的‘使能’因素和

① 西方的实证经济学奉行所谓科学哲学的价值中立,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体现,其意欲摆脱的,正是其信奉并贯彻中的。

② 翟学伟:《立足中国现实,多出原创思想》,《新华日报》2018年10月23日。

③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④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

最隐秘的成功密码,是上述五大要素最底层的‘元要素’。”^①

诸多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合情合理的行为,若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解释中易被视为对理性的偏离。西方文化所塑造的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而中华文化所塑造的以家为核心不断向外延展的道德伦理体系,使得双方在经济学中对个人理解的基本假说预设难以通适。西方文化中,将个体假定为经济人总体是符合的,这与其文化取向有着一致的精神。^② 而中国社会作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若也简单借鉴经济人假说,显然有削足适履之感。梁漱溟将伦理本位解释为关系本位^③,即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中的伦理内涵,这样一种关系理性所塑造的个体,既非纯粹的自利经济人,也非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也不能谓其为集体主义,它是将对方利益、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一起,追求动态皆有合理增进的理性模式,这其中饱含着中华文化中仁学和中庸的极致精神追求。此文化追求中已自具节约交易成本的前置要素,所以张五常才说“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本钱”。^④ 文化自信离不开学术自信,现有的经济学研究还较少关注这一基于中华文化的理性模式,也尚未发展出处理这一理性模式的技术,包括分析性数理模型和经验性检验模型等。中华文化务实而温润,被方东美称为是“早熟”的文化,与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展现出高度的人文精神。^⑤ 倘若关于人的基本假说重新展开探索,则诸多现有理论与发现都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已经在结合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的竞争优势理论、考虑文化的人力资本理论、道德资本理论、益贫式增长理论、代理收益理论、有为政府理论、隐性契约与公司治理理论,等等,^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三、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实践离不开中华文化的衡量维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同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造就“日不落帝国”的繁荣,李斯特创立德国历史学派俾斯麦推行开启了德意志的崛起,中国经济学研究同样要在时代大潮中经历中国发展实践的检验。只有实现应然性与实然性的高度统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就方能得到世人和历史的公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也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中蕴含着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孕育着现代性。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未曾割裂。因此,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所呈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现代经济文明,其特征就必然饱含着中华文化的塑造。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实践,需要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加以检验,需要在中华民族现代经济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加以检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大重要特征中,除了

① 徐飞:《儒家经济圈为何在全球“出圈”》,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6 月 30 日。

② 西方的政治学者对此也有反思,比如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④ 张五常:《经济解释》,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

⑤ 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⑥ 洪银兴:《洪银兴自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厉以宁:《文化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王小锡:《道德资本研究》,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范从来,2017:《益贫式增长与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经济研究》第 12 期;陈冬华、范从来、徐巍,2023:《公司治理新论》(上、下),《会计与经济研究》第 1 期与第 2 期。

第一项“人口规模巨大”是一个客观事实,其他四项都折射着中华文化的光芒。“天下大同”“不患寡而患不均”“克己复礼”“变化气质”“民胞物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近悦远来”“王道”“协和万邦”,等等,这些中华文化中的珍贵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和思想源泉。因此,中华民族现代经济文明,必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经济文明有着迥异的文化旨趣和生活意欲,是立足中华文化的人类经济文明新形态。就中国经济学研究而言,其研究场景是中华文化所构建的社会,其初心发自中华文化五千年不断自新的连续观念,其团队为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并深爱之的中国学人,唯此,其实践必也离不开中华文化维度的衡量与检验。比如,何为中华文化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此应如何转变成中国经济现实中的实然;再如,西方的 ESG 内涵受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如何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构造中国式的 ESG 概念;又如,对于中华文化的核心伦理观念(比如孝悌等),如何让经济政策(如税收政策)的制定起到更大的文化弘扬作用,等等,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担负的重要文化使命。

四、结 语

广义来说,一个社会中的经济学研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经济学的学习、研究、教育和传播的过程,就是该社会中这一活动的参与者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就是“人文真实”不断被生产和制造的过程。千万不要忽略经济学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的输入。比如,我们在学习、研究、教育和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只能使用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加认可经济人假说,将来其目标函数就会更加收敛到这一假说,这种内化的过程就是一种反身性,从而形成了人文改变的真实性。这样的例子还有太多,不在此一一枚举了。总之,忽略经济学研究的这一效应,其后果无法估量。无论经济人假说、有限理性假说还是行为主义假说,都没有脱离西方文化中个体主义的掌心。如果能够构建中华文化意义上的道德人假说(哪怕退后一点,社会人假说),让学习者、研究者、教育者和传播者感受到对人性不同理解,定可以带来全新的社会建设功效。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因此,站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度,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文化属性,具有时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研究担负起新的更大的文化使命,更好地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经济文明。

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道德经》宏观治理思想的启示

陈彦斌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不断发展完善,是举世瞩目的中国

* 陈彦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70。

经济伟大增长奇迹的有力支撑和保障。为持续高效地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作为单独一章,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目标与要求做出了系统部署。^①2016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近年来中国提出了诸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跨周期调节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愈发显著,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中国的宏观调控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比如,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有待优化、政策工具有待完善、政策协调性有待加强等,这不仅会削弱宏观调控效率进而影响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等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还会影响长期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反复强调的“两个结合”重要思想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指明了新方向。从宏观调控的视角来看,《道德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大量行为准则,对宏观调控实施者和宏观经济参与者都具有深刻影响。“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因此,将“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应用到“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独特优势,形成与时俱进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一、《道德经》蕴含了丰富的宏观治理思想

《道德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丰富的宏观治理思想。^②其主旨思想是以“道”为核心来管理和协调国家治理所涉及的各种关系。“道”一词,包含万物根源的道体、总结规律的规则、约束行为的道德等三个层次的意思。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含义常称为道,第三种含义常称为德。^③在《道德经》中,道和德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有道才能有德,有德有助于有道。笔者认为,《道德经》中蕴含了六大治理思想,与当今主流宏观调控理论的内涵相通。

第一,《道德经》倡导治理定位于国家要有所作为,并反对乱作为,这与宏观调控的功能定位相一致。

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应积极有为,即政府应采取宏观政策积极对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另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应消极无为,即政府不应对经济波动进行调节。支持宏观调控应该消极无为的论点主要包括宏观政策时滞较长、经济预测较为困难、货币政策在长期中无效等。从短期视角和危机应对视角来看,这些论点的说服力都不强。宏观调控应该积极有为已经成为主流共识,因为只有靠宏观政策才能避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 本文中有关《道德经》的内容,引自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③ “德”是中国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出现在三千多年前,其含义也经历了较大演变。在殷商时期,“德”指的是货币等财富,殷商甲骨文中的“德”还有祭祀先祖的意思。到了周朝,“德”的含义逐渐从宗教道德转向了政治道德,用以表示政治统治的权威。在春秋战国时期,“德”受到了更为全面的重视,儒家不仅提出了以“仁”为全德代表的各类具体德目,而且创建了以“德”为统领的道德修养理论和道德哲学体系。道家也非常重视“德”,但是道家对“德”的含义的理解和界定却不同于儒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德”的诠释具有双重含义。就“道”作为万物之根本的哲学意义而言,“德”指的是由此而产生的万物本性。就“道”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准则的伦理学含义而言,“德”指的是人的本性或品德。在《道德经》中“道”和“德”是合二而一的,共同贯穿于《道德经》始终。参见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债务—通缩”恶性循环和恶性通胀等市场失灵导致的严峻问题。不过,宏观调控定位积极有为的目的是解决仅靠市场机制无法恢复或恢复正常状态偏慢的问题,而非为了取代市场和过多干预经济运行。

与之类似,《道德经》明确指出国家需要有所作为,而且明确反对乱作为。《道德经》第二章指出,“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清晰地表明了国家需要有所作为,只是要做到“不恃”。第三十七章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这完整和清晰地描述了国家宏观治理与经济运行之间的逆周期调节关系。此外,第二十九章指出,“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这要求政府不能强行作为和不能采用极端措施乱作为。第八章中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和第六十四章中的“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都说明,国家看似无为,但实际上是不与民争利、是“有为”地提供市场所难以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也展示了《道德经》的“无为而无不为”之道和“不争”之德两者融为一体。

第二,《道德经》倡导治理要“以百姓心为心”,这与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相一致。

虽然西方主流宏观理论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来阐述最优货币政策,但在实践操作上主要追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两大目标。即便实现了这两大目标,也不能说明宏观政策就是最优政策,因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最终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宏观经济实践有新的认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了西方宏观调控理论所追求的双稳定目标,更深刻地阐释了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宏观经济理论需要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强调宏观政策的双稳定目标,也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最终目的。

《道德经》明确指出,国家没有自己的一贯利益,而是把人民利益当作自己的核心利益、最高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以百姓心为心”源自《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其中的“圣人”可以解读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或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在《道德经》中具有多方面体现。其一,第四十九章指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这要求国家要没有选择性地善待他人,如同善良父母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孩子。其二,第六十六章指出,“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这表明国家以人民幸福为根本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戴。其三,第八十一章指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表明人民幸福和国家利益并不矛盾,人民越是幸福和富足,国家就越是强盛。

第三,《道德经》强调规则化治理,这与主流宏观调控理论倡导规则重要性高于相机调控的基本原则相一致。

按规则实施的宏观调控是指政策制定者事前公布政策对各种情况的反应机制,并承诺遵循所公布的规则。相机调控是指政策制定者自由地做出判断并选择当时看来合适的政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建议使用通胀目标制等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观点要更为主流。不过,近年来理论界和政策界认识到仅仅是物价稳定还不足以保证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故宏观政策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由于国内外政策实践中按规则调控与相机调控并存,当前理论共识是宏观调控应该兼顾规则与相机调控,但规则的重要性要高于相机调控。

《道德经》有多处蕴含了规则化的治理思想,高度重视按“道”,即遵循规则化治理。其一,经济运行本身有规律和有恢复至动态化稳态的趋势,规则化治理才不会破坏经济运行规律和趋势。例如,第十六章指出,“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第三十九章强调,“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

将恐蹶。”可见,不遵循规则化治理会导致严重后果,由此再次凸显了规则化治理的重要性。其二,由于有限信息和万物演化,因此需要兼顾规则和相机调控。第七十一章阐述了有限信息问题,“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同时,《道德经》多处提及了万物的不稳定性与演化性。除了第三十七章和第十六章之外,第十五章形象生动地讨论了演化的动与静:“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由于经济运行广泛存在有限信息和演化性,宏观治理难度很大,需要在遵循规则的基础上兼顾相机调控,才能帮助经济体实现稳定化目标。

第四,《道德经》倡导治理者要怀不争之德,这与宏观调控理论要求政府与市场要和谐相处的基本前提相一致。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宏观调控理论面对的核心问题,既有国际实践经验难以给出较好答案,要么过于看重政府的作用,要么过于看重市场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则更加合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宏观调控而言,政府与市场两者同样不能对立。实施宏观政策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也要发挥好市场的作用。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民众有时候具有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的情绪,很容易导致投资过度或不足,因此,经济运行内在具有不稳定性,需要采用宏观政策予以平抑。但这种平抑不是要直接干预市场,而是通过宏观政策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因此,虽然宏观政策由政府制定,但关键前提是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遵从《道德经》的思想,国家对民众、政府对市场、强者对弱者,都要怀不争之德,其本质就是政府与市场要和谐相处。例如,第八章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六十四章还指出,“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宏观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民众福利,因而国家不能与民争利,宏观调控不能与市场争长短。凡是市场和民众能够做的、愿意做的,就要让市场和民众发挥作用。凡是市场和民众不能做的、不愿意做的,出现了市场失灵,国家就要勇挑重担、发挥作用。

第五,《道德经》倡导治理要行长久之道,这与宏观调控理论倡导政策空间管理和退出机制以增强政策可持续性的新共识相一致。

在各国宏观政策实践中,政策空间管理非常重要。如果政策空间不足,就容易发生政策急转弯,这会打击市场信心,进而导致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道德经》也蕴含了这一道理。第五十九章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由此表明,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留出空间和更好地保持连续性。同时,政策空间不是越大越好,需要适度。政策空间过小,会导致宏观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空间过大,会导致宏观政策成本过高。其中,第四十四章指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意味着政策空间过大是一种浪费。第二十三章进一步指出,“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意味着政策发力要兼顾空间管理,否则将难以持续。

宏观政策退出机制是指当经济面临的不利冲击已经结束或快要结束时,需要使应对冲击所采取的宏观政策有序退出。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时期采取的非常规宏观政策,更是需要退出机制,这有利于节省和预留政策空间。对此,《道德经》第九章强调,“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不难发现,其中蕴含了与退出机制相关的处世与治理智慧。

第六,《道德经》多处蕴含了治理可信度思想,这与宏观调控理论所倡导的预期管理以提高宏观治理效率的理念相一致。

预期显著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运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认同理性预期,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短期内价格具有黏性。正是由于这一关键性假定,新凯恩斯主义论证了预期之中和预期之外的宏观政策都可以显著影响总产出等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由此使得凯恩斯所提出的宏观政策干预主义得以延续。由于预期会显著影响经济运行,所以宏观政策效果取决于公众对于政策的信心。正因如此,现代宏观调控理论更加强调预期管理,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来引导公众预期,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效率。

《道德经》的多处论述与预期管理相关。第十七章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其中就蕴含了政策可信度的重要性。第六十三章的“夫轻诺必寡信”蕴涵了政策制定者的声誉与道德对于政策可信度有直接影响的思想。进一步地,第七十章强调,“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这其中蕴含了规则化宏观调控可以更好地管理预期的重要理念。

二、借鉴《道德经》,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要兼顾一般性和中国特色。一方面,通过构建宏观政策新理论框架,来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一般性。基于中国实践,在国际性通用学术话语体系下,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一般性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框架,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而且有助于推广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比如,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统一框架。^①另一方面,通过吸收《道德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借鉴《道德经》中的治理思想,可以进一步发挥中国独特优势,从而更好地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借鉴《道德经》思想,宏观调控需要敬畏“道”的力量,充分研究、掌握和遵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万物的产生、滋养、勃兴、消亡,都有其规律,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同样需要遵守规律。人的情绪波动会导致经济波动,因此需要宏观政策干预。工资刚性、金融加速器效应、磁滞效应等机制和“债务—通缩”效应等市场失灵问题都会导致经济恶性循环,因此更需要宏观政策干预。但是,宏观政策并非万能,不仅经济冲击与波动本身难以预知,而且公众对政策行动的反应也难以预料。遵循《道德经》的“道法自然”思想,需要采用“规则化宏观调控+市场机制”的政策组合最大程度地让宏观调控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具体而言就是采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结构改革”的新型政策模式。

第二,宏观调控需要更加重视“德”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及制度约束。《道德经》中的道和德融为一体,有道才能有德,有德有助于有道。理解《道德经》的这一深刻思想,对于更好地制定宏观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现代宏观经济学虽然也开始强调通过央行行长的学术声誉与口碑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但并没有直面问题和根治问题。声誉与口碑只是外在表象,《道德经》则凸显内涵实质。宏观政策促成经济体健康运行,必须要有道,即坚守规则性定位,这也是宏观政策制定者有德的关键前提。有道促进有德、有德维护有道,才能形成宏观政策制定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良性循环。

第三,宏观调控需要积极创新以适应数字经济形态变化。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幅跨越,都伴随着经济形态、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的剧烈变化,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宏观政策体系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与创新,否则调控效率会大幅下降。当前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① 陈彦斌,2022:《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经济研究》第11期。

新技术浪潮,在未来还会延续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形态与运行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主要经济体的宏观调控效率均有所下降,宏观经济学似乎出现了所谓的“麻烦”。现在要积极主动地创新宏观调控模式以适应经济形态的变化,要创新性地使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思想对经济结构和长期增长机制体制约束因素进行相应调整与改革,才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道德经》的宝贵思想“蔽而新成”有机统一了创新之变和守正之不变,确保了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创新之变体现在建议国家宏观经济治理需要不断创新。守正之不变体现在建议“保此道者”,要追求以人民幸福为最终目的的宏观调控模式,要“上善若水”般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市场运行的关系。

第四,宏观调控需要吸收《道德经》中的有益思想,来弥补宏观政策理论发展的不足。虽然宏观政策理论与实践在与时俱进地发展,但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宏观经济学二分法导致宏观政策理论难以统筹短期和长期;宏观政策对于结构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对于道德力量的关注也相对不足。可以用《道德经》的关爱人民、结构优化、治理天长地久、道德力量等宝贵思想,修补现代宏观政策理论的不足。当然,也可以用宏观调控的主动性、目标明确和问题导向性等积极思想,更好地解读《道德经》。例如,通过吸收宏观调控的主动性,《道德经》思想可以在本就蕴含的前瞻性基础上更富战略性、主动性和建设性。再如,在遵从《道德经》“柔弱胜刚强”思想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吸收现代宏观调控理论尤其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的目标明确和问题导向性等优点,从而进一步增强《道德经》思想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导性。

总体来说,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相比,具有“三策合一”的重要特征,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宏观调控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此基础之上,再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经》中的治理思想,是落实“两个结合”的有益探索,可以进一步发挥中国独特优势,更好地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从而更好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进高质量发展。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冯根福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的内在作用机理,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构中国经济学底层逻辑的影响,不断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文化使命。

* 冯根福,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邮政编码:710061。

一、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 不断赋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鲜明的民族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在内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自主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学从改革开放前主要接受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改革开放后广泛借鉴西方经济学，再到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建构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其次，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再次，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经济思想精华，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的沃土。“两个结合”是一个新命题但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度重视“第二个结合”的问题。在“第二个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1943年5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首要特点就是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强调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习近平总书记还身体力行，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一方面，他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积极赋予经济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的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等，无不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智慧。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实践探索，是坚持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关键词是“中国自主”。“中国自主”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又主要体现在“两个结合”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智慧和思想精华是以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等条件为依据的,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以当代的政治和经济等条件为根据的,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坚持“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为思维坐标,积极汲取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智慧和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鲜明的民族性。

二、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动机和行为影响, 科学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思想,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思想的提出,对于科学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能是某个抽象概念或假设,而只能是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的“中国事实”,主要理由是抽象概念或假设缺乏唯物史观;另一种主张则认为中国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具有演绎逻辑性质,因为无论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具有演绎逻辑的性质(需说明的一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未因采用演绎逻辑的方法而缺乏唯物史观)。上述两种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相比于已经经历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还不长,还有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与问题有待探索和总结。因此,在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还处于筚路蓝缕的开拓阶段,应鼓励学者采用不同的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经济学。

采用演绎逻辑的方法建构中国经济学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和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国际上的经济学接轨。如果采用演绎逻辑的方法建构中国经济学,那么提出经得起检验和反驳的底层逻辑或经济学核心假说则是关键。关于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国内学者看法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而世界上各国的人的经济行为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以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普适性的市场经济学,因此可以把它的核心假说即“经济人假说”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另一种观点则完全否定上述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此绝不能学习和借鉴它的“经济人假说”。

上述两种观点和认识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说”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他主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即从人的天性与本能分析和概括人的经济动机与行为。毫无疑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自然属性,因而都具有相同的天性和本能。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研究而获得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市场经济知识才为中国学者广泛学习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也存在一个根本缺陷,这就是它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人的经济动机和行为的影响。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体,影响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不仅有人的自然属性,而且还有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研究表明,人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不仅对其经济动机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人的天性和本能的发挥还常常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对其经济社会制度和环境形成有重大影响。因此,生活在不同文化中

的人的经济行为存在有明显的差异。五千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受两种不同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质的区别,所以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经济行为自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追逐个人财富最大化的动机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财富分配的偏好方面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一个美好愿景就是共同富裕,古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与天下同利”“贫富有度”等思想至今在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而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崇尚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和个人追求财富收入最大化。而财富分配偏好的不同,又进而影响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民众收入差距容忍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受各自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经济动机和行为存在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时,绝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正确的做法是,应根据人的双重属性的特点,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动机和行为的影响,科学分析当下中国人的普遍经济动机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抽象和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或核心假说。

三、积极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的相关理论研究, 不断丰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内容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学要坚持“两个结合”,继续深化文化与经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问题研究逐步重视起来,相关成果不断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开始,《经济研究》编辑部就联合国内有关高校,发起全国性的“文化与经济论坛”,每年举办一届,先后从“基于信任的视角”“基于创新创业的视角”“基于经济观念的视角”“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基于中国特色文化的视角”等方面对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除此之外,《经济研究》近年来还不断推出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经济研究》的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在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

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在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提出的坚持“两个结合”和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的文化使命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面向未来,进一步深化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至少面临着以下两大瓶颈和挑战:

第一个瓶颈和挑战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定义“文化”概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文化”这个概念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类。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分支。因此,从经济学的视角科学界定“文化”概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不仅是搞好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搞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基本前提。然而,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定义“文化”概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文化的某一支或某一支中某一要素的视角,如从儒家文化、方言、宗教、信任等视角分析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鲜见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文化”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尽管从经济学的视角界定“文化”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的难度巨大,但如果不攻克这个难题,不在经济学界达成“文化”概念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的共识,那么就很难对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学理化研究,就很难在一个平台上对文

化与经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因此,未来深化文化与经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科学界定“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至关重要。

第二个瓶颈和挑战是如何科学认识和把握文化影响经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由于“文化”概念不清晰,大大增加了科学认识和把握文化影响经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的难度。目前,许多文献关于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分析基本上还停留在论断的表述层次上,如“文化对经济发展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等,并没有从学理的层面深入讨论和揭示文化影响经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因此,未来深化文化与经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学理的层面深入分析和揭示文化对经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的论述,为我们分析和揭示文化对经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的“两个结合”的提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分析和揭示文化对经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宏观作用机制提供了科学方法。他说:“‘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这表明,文化对经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影响的宏观作用机制主要是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而“道路、理论和制度”又进而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为分析和揭示文化对经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影响的微观作用机制提供了科学方法。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①这表明,文化对经济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的微观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进而影响经济。

努力突破上述两个瓶颈和挑战的意义不言而喻: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文化与经济,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不断用新的理论成果充实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内容;另一方面,可以为世界文化与经济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做出中国经济学者独特的理论贡献。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黄先海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工作之一,其中又以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最为重要和迫切。从本质上讲,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的深刻解释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科学解答,且这些现象和问题、解释和解答都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最为显著的一大典型化事实是:后发转型大国,几乎所有中国经济现象和问题都与“后发”、“转型”和“大国”这三个关键词有关。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许多领域一直奋力追赶前沿,并不断实现超越;作为转型经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页。

* 黄先海,浙江大学,邮政编码:310058。

体,中国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模式,以确保有效、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率先定义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支撑就在于深刻阐明政府与市场、追赶与超越、合作与竞争这三大关系及其运行机理。事实上,对这三大关系相关议题的关注和讨论中国古已有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可资汲取的人文经济智慧,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迪和思想借鉴。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和处理这三大关系时,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又要结合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进行理论创新。

一、政府与市场:从善因论和轻重论到赋能型政府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考与探索,不仅贯穿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嬗变历程,也是世界各国经济治理和制度变革的核心。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上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引致的政策实践内容和风格的不同,从根本上造就了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重要一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阐明一种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早在古代中国,思想家们就已经开始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彼时的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管仲的轻重论为代表,主张政府应积极地干预经济;二是以司马迁的善因论为代表,强调自由放任政策在经济治理上的最优性。管仲在其所著散文《管子·国蓄》中系统地阐述了轻重论的核心思想:“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横可得而平也。”大意是,民间物资若有盈余,(百姓)便会低价将其卖出,此时君主应当以低价收购这些物资;民间物资若有不足,(百姓)便会高价将其买进,此时君主应当以高价出售这些物资。如此低买高卖之后,君主必然获利丰厚,且物价也趋于平稳。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轻重论提倡经济的管理者应当审时度势地积极作为,以“低买高卖”的基本策略参与民间市场交易,从而在宏观层面平抑商品数量和价格波动。与之相对,善因论则认为治国理政最高明的手段是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想方设法地干预和约束,甚至与百姓在民间市场展开竞争实属下策,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写:“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大意是,(管理者对人民)最好是顺其自然,不做额外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将集体行动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再次是教育劝诫,宣传和倡导合宜的行为;从次是订立规章,通过规范性和约束性制度实现整齐划一;最差的做法是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与民争利。

今天,当我们再度审视政府与市场关系,探索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优模式时,从先贤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并结合当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和要求加以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吸收轻重论和善因论分别对政府和市场在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中重要性的肯定,认识到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都是经济治理的有效手段,尽管原理和效果不尽相同,但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政府与市场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事实上,政府和市场在调控经济上各有侧重、各具特点,这就意味着良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必然令两者互为补充并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因此,我们既需要“有效的市场”,又需要“有为的政府”,唯有坚持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经济方能行稳致远。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成熟,中国业已形成对新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框架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此进行了提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已得到

进一步巩固,但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政府角色演变历程,结合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实际和新目标,我认为在未来着力构建赋能型政府可能是这个难题的一个解。所谓赋能型政府,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下,对市场主体资源配置和动态竞争能力进行中立赋能,实现市场增进、分配优化与整体增长可持续的政府。赋能型政府的构想致力于回答当前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治理实践中长期存在但尚未解决的两大问题,也即构建怎样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才能实现:(1)经济循环动态中的最优均衡;(2)阶梯型技术进步路径上的充分创新。区别于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守夜型政府(侧重严格限制政府行为以保证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规制型政府(侧重对市场主体有效规制以矫正市场失灵)和发展型政府(侧重引导甚至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以加速结构转型),赋能型政府如下的三大典型特征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第一,通过对市场微观主体进行中立的竞争赋能,规避知识约束和俘获困境,提升政府的介入效率;第二,通过非价格扭曲的要素供给扩张,增进市场主体的资源横向配置能力与代际更新能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第三,通过非有偏选择的分散化创新激励,在跨期福利最大化条件下实现社会加总技术进步率的持续提高,提升动态增长效率。为充分释放赋能型政府的潜能,要加快构建四大配套政策体系:一是面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赋能政策体系;二是面向前沿产业与技术边界的供给侧创新政策体系;三是激活大国规模优势的有效需求扩张政策体系;四是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数据管理政策体系。

二、追赶与超越:从天时地利人和到动态竞争优势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3678.7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以不变价格计算,40年间增长了33.5倍,年均增长约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2.9%左右的增速,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1位跃升至第2位,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令世界瞩目。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不仅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还令中国在许多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幅缩小,甚至超越具有传统优势的经济体,成为新的领跑者。讲好这些从追赶到超越的中国故事,向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借鉴,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

在治国理政所遵循的原则和理念方面,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对外竞争力,中国素有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统。《孙膑兵法·月战》有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尽管这里强调的是作战时顺应天时、借助地利、谋求人和,且三者缺一不可的重要性,但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在制定战略和政策时,充分考虑气候、地理和人文等内外部因素,通过扬长避短式的协调和整合,激发它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或为达到这种状态创造有利条件。一言以蔽之,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充分挖掘和发挥比较优势。“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暗含这样一种观点:特定因素在特定方面究竟构成优势还是劣势,取决于利用这种因素的方式,而不是它本身。因此,对于落后或弱小的国家而言,统治者或管理者越能把握自然或人文条件的规律和特征(尽管它们看上去是某种“劣势”或“缺陷”),并且在实践中顺应或利用它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就越顺利,对先进或强大国家的追赶也越迅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念并非简单的宿命论,而是在给定条件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及当人的行为和其所面临的条件相适应时可以产生积极的结果。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至少部分归功于对“天时地利人和”理念所包含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认同和遵循,该理论也日益成为经济学家们公认的后发国家追赶甚至超越先发国家的方法论指南。然而,当前的理论并未充分揭示和阐明

比较优势的全部潜力和相应策略的复杂性。原因在于,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其给定不同国家的禀赋或技术差异,并在此条件下阐释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的影响因素、决定机制和福利效应。尽管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我们理解早期国际分工贸易结构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难以解释诸如中国等后发国家通过创新活动推动技术进步,实现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的动态优化,进而完成对发达国家追赶和超越的历程。因此,有必要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视角建立一个提炼上述历程中成功经验的新理论,其基本逻辑是:后发国家的创新能力或国际竞争力——集中体现为其对领先国家或特定国家的领先领域的追赶速度和超越可能性——取决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和长期贸易模式,而国际分工地位和长期贸易模式又由内生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优势决定。以中国为例,利用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其在许多领域向发达国家发起追赶并成功缩小差距或实现超越的秘诀所在。首先,中国在早期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并为之后的转型奠定基础,此为静态比较优势的发掘和利用阶段;其次,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国外关键资本品的引进,中国全面提升了人力资本和高端物质资本水平,优化了要素禀赋结构,推动经济部门由劳动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此为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阶段;最后,伴随要素禀赋变化引致的创新活动倾向性调整,以及政府适时采取的赋能型政策,中国在新经济领域培育出与发达国家匹敌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此为“换道超车”的动态竞争优势形成阶段。上述“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动态竞争优势”的演变路径不仅是对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经验的高度浓缩和概括,也揭示了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实现由追赶向超越转换的一般模式。

三、合作与竞争:从以和为贵和大争之世到合作双赢型竞争

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亦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然而,在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本国优先主义和单边主义不断抬头的今天,传统的全球化体系受到了多重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快速崛起必然在很多领域引入新的竞争,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或脱钩,相反还可能在更大或更高的层面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如何理解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如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处理好合作与竞争关系?如何将合作与竞争关系理论应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些显然也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回答的问题。

对于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解读,中国古代著书立说者甚多,其中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儒家提倡以和为贵,反对战争,认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融洽和睦、井然有序的,倡导建设和谐安宁的社会。《礼记·中庸》记载:“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说,和谐是天下共同遵循的原则和法度。由此看出,儒家认为维系世界及其中个体间关系的根本是广泛且一致的和谐与合作。与这种理念针锋相对的是法家所提出的“大争之世”。《韩非子·八说》记载:“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大意是,身处大争大斗的年代,还遵循谦卑恭敬、拱手礼让的老规矩,绝不是圣人治国的方略。由此看出,法家认为人类所处的环境本质上是一个弱肉强食、竞争激烈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追求所谓的和谐,往往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儒家和法家争锋的焦点在于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儒家认为和谐是这个世界的底色,而竞争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因而与整个世界不相兼容;法家则认为世界处在无休止的竞争之中,对和谐的追求既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也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因而在世界中无法存续。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世界既不是一片祥和的“桃花源”,也不是充满纷争的战场,合作与竞争孪生于各个领域。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有对竞争习以为常的法家智慧,也要有追求大同

世界的儒家胸襟。更进一步地,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应致力于在竞争中寻找合作机会,在合作中开展良性竞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既要在竞争中寻找可能的利益交汇点,避免过度竞争造成的“囚徒困境”式低效率;又要在合作中为潜在的良性竞争预留空间,加快合作双方在相关领域取得进展和进步,这就需要引入合作双赢型竞争机制。合作双赢型竞争的宗旨是创造一种有效兼容合作与竞争的模式。在该模式下,一方面,单纯的竞争会导致双方在投入上开展“军备竞赛”,过多的资源被用于削减对手而非提升自己的利益。如果可以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双方都将以更小的代价换取更高的收益,且各自的境况比参与合作前更好;另一方面,单纯的合作会导致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懈怠和懒惰,且面临较高的背叛风险。如果能够在某些领域开展公平竞争,不仅可以为双方的互动螺旋式进步注入新动能,还能通过降低破坏合作的潜在获益约束各方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合作双赢型竞争的本质是一种新型正和博弈。与传统正和博弈相同的是,在这种博弈中,参与博弈双方的收益与损失之和大于零,一方收益的增加不必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出现一方收益增加带动另一方收益也增加的情形。不同于传统正和博弈的地方在于,传统正和博弈为参与双方提供净收益的多寡单调地取决于合作的规模和强度,合作越多越牢固则净收益越大,合作越少越松散则净收益越少,甚至出现负收益(此时即为负和博弈);而在合作双赢型竞争所包含的新型正和博弈中,双方的净收益水平会随着合作规模和强度的增长先升后降,因而存在某个最优的竞争与合作的配置模式(一定程度合作和一定程度竞争的组合),使得双方的净收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合作双赢型竞争。

基于中国传统制度的经济学自主创新*

龙登高

中华传统文化与制度中的经济元素,在共同塑造中国经济演进道路的特性与作用,在经济学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使命,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期待着富有价值的思考。^①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现象文化层面,深入经济制度层面的系统考察相对不足。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人们对传统优秀元素的挖掘、解读存在一定片面性与局限性。其中一个深刻的原因在于,20世纪中国贫穷落后挨打,在与西方的碰撞与交流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与否定,甚至如废除汉字一度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②而“西方中心论”也一度传播。

* 龙登高,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84。

① 一些学者提出过创见。如吴承明,2001:《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李伯重,2011:《“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叶坦,2013:《经济史学及其学理关联——基于史实与逻辑的视域》,《经济动态》第10期;杜恂诚,2019:《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期;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邓钢:《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与资本主义停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② 20世纪前期,钱玄同、鲁迅、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胡适、郭沫若、吴玉章等各派学术领袖在废除汉字的诉求上惊人地一致,并付之行动。这并非孤立的现象。参见崔明海,2017:《存与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汉字改革问题的思想争论》,《学术探索》第1期。

本文将正本清源,在原始史料中挖掘中华传统的制度元素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经济学解释,特别是从源头上提炼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以中国经验与中国话语反思和丰富现代经济学体系。吴承明指出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自司马迁《货殖列传》《平准书》以来长达两千年的“食货学”传统,正是我国的经济史学的本土源头。^①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工程,本文集中于近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展开初步探索。以地权为轴心运行的农业时代,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有限的土地养活了全世界1/4的人口,这一成就的基本逻辑就是以地权为核心配置资源基础之上的个体家庭农庄与精耕细作,土地产出高。地权制度是传统中国经济的根基,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核心,还是当前农村经济改革攻坚克难之所在。历史上的农地产权及其交易形态比当今更丰富多样,具有理论拓展性;系统揭示其特征、运行机制与近现代变迁,并澄清以往的各种认识误区,譬如认为中华传统缺乏产权意识与契约精神,而忽略了发育深厚的土地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从而忽略了传统中国朴素市场经济的基因及其奠定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

一、传统地权制度:产权本源与理论拓展

传统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发育充分,土地私有产权、法人产权、国有产权等形态长期并存,近千年来国有土地的比重很小,土地私有产权居于主导地位,从中又发育出法人产权,即特定群体、民间组织、机构所拥有的排他性产权,^②传统中国多称为“公产”。^③土地产权又分多个层次,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形成地权交易体系,宋代在买卖、租佃、抵押之外,出现典,明清出现活卖、押租及各种占有权(如田面权)的交易。其中典权、田面权富有中国历史特性。^④相比发育水平较低的西欧、日本等传统时代的地权与要素市场,中华地权制度至少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和独有的理论价值:

第一,中国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源远流长,发育充分,表现多样,相比而言,西欧中世纪与前近代的土地产权发育较为单一和滞后,交易形式有限。英国至17—18世纪历经两百多年的圈地运动才形成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并由此奠定了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日本更是到1870年代明治维新才确认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朴素的地权与要素市场是中国在农业时代长期领先世界的制度基础,但英国、日本经历革命后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就英国而言,产权体系的确立被视为其农业与工业的制度基础,但与议会制度一样都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并非其既有传统。18世纪以前的英国法律体系很难说是鼓励创新的,英国的产权体系十分僵化,无法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产权配置。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新兴财富阶层通过议会制订一系列新的法律,18世纪之后才逐渐改观。^⑤

第二,契约表达产权。民间契约是土地权利的产权凭证,长期自发形成并为社会共同遵循的习俗与惯例成为产权制度的基本保障,政府认可这种产权制度并加以必要的法律背书。“民间执业,

^① “食货学”聚焦经济社会现象、制度与国家治理,其内容包括田制、物产、水利、户口、赋税、货币、财政、漕运、仓储、乡党(乡村社会组织)等各方面,这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学术资源。参见李伯重,2011:《中国经济史史学的话语体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②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邱澎生,2006:《由公产到法人——清代苏州、上海商人团体的制度变迁》,《法制史研究》第10期;龙登高、王正华、伊巍,2018:《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

^③ 陈月圆,2023:《传统民间公产制度及其变迁:1644—1949》,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

^④ 龙登高,2013:《典与清代地权交易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Denggao Long and Yi Wei, 2023, Chinese Civil Society and Spontaneous Order: Native Tradition 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Royal Collins Publishing.

^⑤ Dan Bogart and Gary Richardson, 2011, “Property Rights and Parliament in Industrializing Britain”,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54(2), 241—274.

契券为凭”，形成了较成熟的契约格式、中人保人、权利保障、违约惩罚机制。不仅所有权，还包括田面权与典权在内的占有权以及使用权等，各层次的权利都通过契约来呈现并以此作为凭据，在家族传承、纠纷处理和市场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论白契与红契，还是分家书，在事实规范层面都具有产权效力。契尾与官印、户籍与地籍则是官方确认产权的配套制度，凡此共同推动了传统地权的制度规范，增强了契约的表达与效力。契约界定土地产权具有稳定的历时效力，可以超越王朝周期和个体寿命的限制，从而不受制于朝代鼎革与代际传承的影响，呈现出可追溯性、延续性以及稳固性等特征。

第三，占有权是指非所有者的土地财产权利，以其要素投入带来土地价值增值，在土地开发过程与市场交易中被界定为占有权，非所有者不仅拥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而且能够行使典当、抵押、担保等权能，从所有权分离出来并以独立形态存在。相较于具有唯一性、独占性的所有权，占有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形成一块土地对应多个占有权的情况。^①占有权具有理论拓展性，^②也表明这一概念的学术价值。占有权在传统中国发育多样而成熟，从而能够被揭示和系统论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

与源自西欧大陆的物权体系不同，经济学意义上的占有权，其内涵超越有形实体，使非所有者的财产权利具有较强的流转性和可交易性。物权(real right)指直接支配实体财物的权利，用以界定特定财物法律上的归属；产权(property rights)则强调对权利本身的支配，不一定是实体物品，其外延要比物权宽泛。我们可以说产权是一束权利(a bundle of rights)，但物权通常不这样表达。物权概念不能离开具体的物，但权利可以脱离具体的物而存在。^③

二、澄清认识偏误，树立历史自信

地权的发育与土地要素市场化，在传统中国不是孤立的存在。其他要素市场化也有其特点与表现。就资金市场而言，放贷收取利息，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原始教义中都是被禁止的，犹太教则仅允许在外地放贷收息。传统中国则不会禁止这种自愿的交易与资金的自由流转，但会从道德上加以抨击。不过，西欧股份、债券市场等金融工具在战争和国家竞争之间发展起来，中国却长期阙如。

劳动力市场方面，由于宋以来中国很少存在西欧中世纪的农奴制，即超经济的人身依附，编户齐民之间在理论上很少有贵贱之分，因此，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可以雇佣和被雇佣。但由于大多数农民都拥有土地或租佃农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较少，所以现代雇佣性的无产者市场滞后。近代中国的一无所有的雇农阶层仅占2%—3%，西欧前近代则占10%—15%。

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在传统中国都有独特的发展，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传统商业与市场具有活力，民间经济时有创新，世界最早的纸币就是民间创新的商业成果，晋商、徽商的经营创新呈现现代性。主流意识形态与政府政策也以“藏富于民”为正统，以“与民争利”为羞耻。专卖限于少数特殊商品，历代的盐、香料，有的朝代还有酒、茶等，政府直接经营的商品或领域是非常有限的。司马迁推崇的治国之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

^① 清业田(指拥有土地实体和全部权利的土地所有权)分解出田底权和独立的田面权。田底权主义可将田底权出典给X，则田面权主和X都拥有对该土地的不同权利内涵的占有权。田面权主还可将田面权出典给Y，从而衍生出另一个权利层面的占有权。参见龙登高、陈月圆、李一苇，2022：《在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土地占有权及其实现》，《经济学(季刊)》第6期。

^② 占有权理论的拓展性还表现在数据产权的解释。

^③ 这使得法学在物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权等概念的内涵、边界与解释等方面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产权概念体系可以不拘泥于具体实物，但在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缺少一种产权形态，相当于法学上的用益物权，从而影响其经济学解释力。

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朝廷间接管理基层社会与民间经济,实行经济自由主义。

由此可见,中国经历了朴素的市场经济演进,显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即使近代经济转型艰难,政局动荡,但到1937年前的十余年,中国逐渐走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探索轨迹,而这一趋势又被此后长期的战争逆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市场经济思想。尊重历史而不盲从先贤。20世纪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很难以当今的市场经济逻辑去思考传统经济的特点,去探寻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①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曾经的非市场经济思潮,可以理解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选择,但不能仅以前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潮与选择来理解中华传统。如果那样,我们既无法准确把握中国传统经济特征及其近代落后的基础原因,可能也无法全面理解今天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21世纪的今天,以市场经济的历史视野去反思,可望更好地把握历史渊源流变与长期趋势。

在近代贫穷落后的刺激下,人们普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相容,^②于是当时人们希冀通过引进西方某些“先进”思想来全面取代中国的文化,以推进现代化。近年来中国社会又出现传统复兴的强劲呼声。21世纪以来,胡锦涛同志与习近平同志先后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次论述,一再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当代价值。

本文从历史实证与理论逻辑上初步揭示与西欧经济道路迥异的中华传统经济的基本特质,试图澄清一些认识。朴素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源远流长,留下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增加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在学术体系上,本文聚焦于土地产权制度,在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领域注入中国经验与中国话语,表明以原创性成果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富有创新空间与学术前景。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

李 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23年6月2日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明确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对中国文化特征、中华文明的深刻总结,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新视角下对创造新文化的恢宏擘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

^① 龙登高,2020:《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误及其探源——基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考察》,《清史研究》第6期。

^② 20世纪的主流思潮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未能原生性地产生工业革命,从而中国不能率先进入近现代而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滞缓,缺乏活力,相比西欧存在诸多弊端,甚至一无是处。然而,揆诸世界,无论曾经领先英国的西班牙、法国与荷兰,还是曾经领先西欧的阿拉伯地区、印度,都未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原发地。反而由后起之秀英国的曼彻斯特、兰开夏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率先发生,进而席卷英国乃至世界,对此现象的解答不一而足。因此没有原发地产生工业革命并不能推导出传统中国经济滞后和缺乏生命力。就历史事实来看,明清时期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与荷兰或英格兰的经济发展各有千秋。

* 李涛,中央财经大学,邮政编码:100098。

遵循。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是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从文化的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更要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视角研究如何加快推进经济现代化、推动人类进步: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为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影响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推动经济现代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解释,更有助于夯实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底气、铸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另一方面,文化是不断传承与创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有机融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就如何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进行探讨。

一、厘清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

就学科定位而言,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既要从拓展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维度,关注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文化艺术产业及政策,更要从拓展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维度,关注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一) 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ics)

传统的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ics)主要是以艺术或文化产业为研究对象,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类似于“教育经济学”或者“健康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在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 中的定义也是如此,在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分类表中,文化经济学作为“Z. 其他特殊领域”下的分支,属于“Z1. 文化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人类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鲍莫尔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将经济学领域积累起来的学术成果开始有效运用到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之中,特别是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共或私人的创意、表演艺术、遗产和文化产业,关注文化领域的经济组织以及生产者、消费者与政府的行为,推动了国际范围内文化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国内学者研究文化产业管理、文化经济等,也是从这个研究定位出发开展工作,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艺术品定价与艺术品市场、艺术文化生产活动经济效益及其指标、文化消费、文化产业发展及政府政策等。

(二) 经济学研究视角的拓展——“文化与经济”(culture and economics)

“文化与经济”(culture and economics)是经济学在研究视角的拓展,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经济相关问题,类似于计量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价值观与信念的度量、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文化与制度的关系等。这里的“文化”是由群体的价值观、信念和偏好所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宗教、社会资本、社会规范、社会认同、生育态度、公平正义、信任、家庭关系、长期意识等内容。^① 以文化为研究视角拓展的经济学研究,最早源于托克维尔、韦伯和班菲尔德等三位学者,他们分别从文化的视角指出,文化是美国政治制度选择、西欧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意大利南部贫困与专制的根源所在。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研究文化问题和重视文化的作用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但后来这方面的研究热度有所降低。近年来,文化与经济的研究重新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内涵中的价值观、信念和偏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进一步聚焦到文化如何影响家庭和个

^① Luigi Guiso,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2006,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 23—48.

人的经济决策,聚焦到文化的传播以及价值观的来源与变化。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不仅包括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也包括理论建模和经验研究。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研究经济现象与问题的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思想史虽有联系,更有差别:经济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传统文化在经济领域的转化与发展,经济思想史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变化;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不但包括了文化当中传统经济思想在内的各类元素,更是包括了传统经济思想之外那些文化要素。

二、把握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的重大问题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识别分类与科学度量

很多经济学者不愿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难以定义、难以定量,而且文化的作用往往与心理、制度、政治、地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难以准确分辨。因此,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部,探讨哪些重要元素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座,并提出科学可信的度量方法,评估其影响的轻重缓急,这是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第一个重大研究问题。

首先,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这些思想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直到今天都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其次,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的识别应该在跨文化的比较中进一步得到明确。有比较才有鉴别。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这些重要元素逐一放入更广阔的文化空间进行国际比较,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出需要深入认识与研究的部分。例如,在对不同的财富观与竞争观、不同的道德观、对家庭或家族不同的重视程度、对未来不同的看重程度、操之在我还是听天由命的世界观等文化元素的比较中,识别和评价这些重要作用,探究推动中国式现代的“文化组合”,更好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动作用。再次,这些重要元素的识别和度量,要采用综合、跨学科的方法。文化元素涵盖面广、影响面宽,对其识别和度量仅仅依靠经济学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应以经济现代化实践为出发点,以追求学术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目的,融合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以建立科学可信的度量方法。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第二个重大研究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特别是我们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等,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建设更富强的国家、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而接续奋斗、迎难而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从宗族家族、集体主义、方言、儒家文化等维度,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新的理论解释。目前,学界已经积累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正是对总书记上述论断的生动注脚。但是,相较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一是还有哪些重要元素支撑了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二是这种影响的机制是什么,三是这种影响是否会因为外部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化对经济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这是众所公认的结论,可是如果谈

论到某个具体的文化元素对经济影响作用如何,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是因为,从研究角度而言,如何在兼顾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把某个特定文化要素的影响单独提炼出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一般而言,重视教育的文化对于经济现代化是重要的,但是教育重要作用的发挥关键又在于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将教育用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三者紧密联系,想要单独析出某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往往非常困难。除此之外,从因果识别的角度而言,有关文化要素影响作用的研究工作还常常要处理棘手的内生性问题。如何有效地排除内生性问题的干扰,保证研究发现的稳健可靠,这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毋庸置疑,这一观点也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支持,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的跨国差异有很好的解释力。文化与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从长期看,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可以定义为基于文化内涵中诸多价值观和观念集合的共识;从短期看,制度上的改变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此外,有些研究中,将文化等同于广义的制度,以此考察特定的文化元素如何影响经济表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第三个重大研究问题。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更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理解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制度变革,厘清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支撑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选择方向;二是,在进一步总结规律的基础上,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制度设计角度开展研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指明发展方向;三是,研究制度完善与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文化,以及中华现代文明新形态的建设需要制度上的哪些努力。

(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现实情况看,文化虽然是慢变量,但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而且从是否有利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而言,是有显著差异的:如果文化朝着对经济现代化有利的方向转化和发展,就会改善一个国家的发展机会;如果文化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那就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发展。因此,文化的形成与变迁,是认识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的重要视角,相应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构成了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第四个重大研究问题。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三个重要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二是传统文化有选择性地继承,三是外来文化他山之石的本土化。

在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过程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是如何以实践为基础建立评判体系,为有选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标准;二是如何以国家的发展目标、政策和规划牵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完善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保障;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如何借鉴中华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研究成果,寻找摆脱“贫困陷阱”和“增长停滞”的文化方案。

三、避免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以下研究误区:

(一) 文化度量上“以偏概全”

“文化”是由群体的价值观、观念和偏好所定义的,其含义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宗教、社会

资本、社会规范、社会认同、生育、公平正义、信任、家庭关系、长期意识等内容。如果在研究中,使用文化某一维度的度量来代表整个文化本身,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就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最后的结论也一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文化的度量一定要采用多学科视角,充分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二) 夸大文化的决定性作用

文化虽然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归根到底经济基础还是决定性的力量所在,文化属于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范畴,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变成文化决定论的研究。

(三) 机械地认为文化是一成不变的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新事物必然会代替旧事物,文化也是会变化的,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变化是缓慢的。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应该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文化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

李曦辉

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有过系列论述。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福建时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同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在2023年6月2日视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能理解未来中国。”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弘扬,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源泉。

一、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前,人类经济研究范式中是没有微观范式的,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只有政治经济学一种范式,就是基于国家与政府维度进行分析。在《国富论》中,斯密引入了经济人假设,使“人”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于是出现了经济学的微观范式。然而,微观经济学范式只是把人假设为“经济人”,不承认“人”还有经济目标之外的追求,从而使微

* 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81。

^①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人民日报》2021年3月26日。

观经济学在基础上就存在“漏洞”，需要我们加以补充完善。这就使得基于中华民族方法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具有了必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求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追求目标与方法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先要进行不同范式的比较。而要研究经济学范式优劣问题，就需要我们回到经济学的本源，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问题。

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原因。《国富论》的开篇（第一篇第一章）就讲到：“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这说明分工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原因，分工是人民福祉改善的重要基础，没有分工就不会出现工业文明。马克思曾经说过：“随着商业来往集中在特殊阶级的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①这进一步说明了分工是生产力进步的直接原因。

规模与范围是生产力进步的环境条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对规模和范围给出了如下定义：“规模经济界定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范围经济为（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②有关规模和范围问题，经济学家早在18—19世纪就进行过讨论，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中就说到：“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其后，他通过举例子的办法解释了这一命题，“一国境内，纵有大河流贯其间，但若毫无支流，其下游又须流经他国国境始注于海，这国也就仍然不能有大规模的商业，因为上游国能否与海洋交通，随时都要受下游国的支配。”“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苏格兰高地的牲畜在英格兰得到了市场。现在，苏格兰高地家畜肉的普通价格比本世纪初大约高三倍，而高地许多土地的地租在这一时期内增加三四倍。”“例如，伦敦街道的铺石，曾使苏格兰海岸一部分不毛岩石的所有者，从向来不提供地租的岩石收到地租。又如，挪威及波罗的海沿岸的树木，在不列颠许多地方找到了国内找不到的市场，于是这些树木给其所有者提供了若干地租。”“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教区移到另一教区去，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必然使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从一教区到另一教区，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以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运输，变得非常频繁，不久就使它们趋于均衡。”这说明，在市场规模没有足够大、市场规则不够畅通时，生产要素与经济体制因素是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而通行着同一规则、足够大、分工细密的市场，是生产力成长的重要环境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也有相同的见解：“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①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指出:“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②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经济发展规模范围的认知已经超越了亚当·斯密的水平,实现了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为未来人类大同奠定了理论基础。

创新是生产力进步的核心要件。除了分工、规模和范围之外,创新亦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推手。自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概念后,^③100多年来,创新要素备受经济学家青睐,已经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推动要素。郭武军和吕阳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序言中对创新进行了描述:所谓创新,就是迫使经济体系改弦易辙,朝着企业家设定的方向前进。这是利润的终极来源,利息、经济周期等现象,都只不过是这个本源现象的衍生品,利息只是企业家创新引发扰动向循环之流渗透的结果,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对这种扰动的适应和吸收;强调了创新就是对既有经济循环的扰动,目标就是破坏现有经济循环,建立新的经济循环,创造更多的利润。熊彼特认为,扰动循环之流、建立新组合,需要从5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采用消费者还不熟悉的新产品;二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三是开拓新市场;四是开拓新原料或半成品供应基地;五是在任何产业中采用新的组织。在对创新活动的研究中,熊彼特发现:“经济当中当然也有像血液循环那样的变化,但也有另外一些变化,它们一看就是不连续的而且突破既有框架,也就是传统路径本身。虽然说这些变化隶属于经济范畴的事情,经济理论也有义务将它们解释清楚,但针对循环之流所做的分析,一条也解释不了这些变化的原委。”“如果有待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是,搞清楚发展及其历史结果是怎么回事,找出某个经济状况或某个特定问题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但凡在这些场合,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理论的作用几近于无。”因为,“来自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的人,会因为习惯、风俗或者除经济以外的其他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出不可弥合的差异。”“理性、自我中心当然主要是用来刻画企业家的经济活动,但其烙印也深深打在了随之而来的道德、文化及社会后果上。”“经验表明,一个典型的企业家从不言退,只会在他筋疲力尽、自知难以胜任的时候,才会谢幕退场,这也是唯一的原因。他们的表现看起来和经济人的描述对不上号,因为经济人每做一件事,都会计算利弊、比较得失,直到实现利弊得失的平衡,超出这个平衡点外的事,他一概不会去做。”在100多年前熊彼特已经发现,经济理论性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像价值文化、制度形态这种经济分析影响因素之外的要素,倒是成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然而,无论是分工、规模范围还是创新,都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在不同人类群体中出现不一样的行为方式。美国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在《文化与组织》一书的开篇就引用小说《十二怒汉》中的情节来说明问题。^④霍夫斯泰德将这种行为的差异归因为文化养成,“文化通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④ 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是一种集体现象,因为它至少部分地被现在或过去生活在相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所共享,而这种社会环境正是人们习得文化的地方。文化包括了社会游戏中那些不成文的规则。正是集体的心理编程将这个社会群体或社会分类中的成员与其他群体或分类中的成员区别开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二战时期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时发现:“每个文化传统中皆有战争的信条。西方诸国共有着某种一定之规(战时惯例)。”^①她认为,“日本人违反西方人战时惯例的一切行为都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借此可以了解他们的人生观及其关乎人类全部责任的信念。”然而,“日本为其战争正当性辩护的诸般前提,即与美国的理念恰恰相反。日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方式,也是迥然相异的。美国认为,战争的起因在于轴心国的侵略行为。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的征服行为,非法地破坏了国际和平。轴心国对中国、埃塞俄比亚、波兰等诸多国家地区的占领,证明他们推行的正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他们的犯罪,践踏了真正的‘共存共荣’之理念,或者说,至少侵犯了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惯例。日本对于战争起因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无法结束无政府之状态。日本必须为等级秩序的建立而战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提出了基于价值文化的域观经济学范式,他认为:“在不同的商域中,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而且,由于制度形态的不同特质(制度形态及其特性又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可谓‘文化是制度之母’),决定或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所以,不同商域中的人的行为,具有理性(客观规律)和非理性(习俗文化)的双重性。”可以说,“一些商域的形成是由制度差异导致,也有一些商域的形成是由国家归属、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地理区域等各种因素所导致。之所以会形成一定商域,总是由于存在一些十分突出且不易改变的因素,特别是深入价值文化内核而形成的特定商域根深蒂固的特质或特色,具有长远和深刻的影响。”“从域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看,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有其‘特色’的,不存在无特色的纯粹市场经济过程,即牛顿式绝对空间中的抽象市场经济。经济活动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都不相同,也根本无法实现不同商域间的文化及制度(秩序)的完全差异化。换句话说,即使是完全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主体,也不可能绝对脱离多元化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因此,其经济理性也必然会被植入文化和制度‘基因’或‘染色体’。”^②

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外学者都认为人的行为要受文化属性的影响,不同的文化氛围会养成不同人群的行为方式。关于经济行为,不仅仅是人的经济理性决定的,其中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衍生品)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每一种文化属性都会塑造出一种有别于他文化的经济行为方式。可以说,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丰富多彩的,它受经济理性支配,同时也受价值文化的影响,两者共同影响着人的经济行为。

二、中西价值文化对经济行为的不同影响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只有经济理性一个维度,致使经济学主流范式只研究人的理性行为,而不染指具有多元特征的文化要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使我们失去了对复杂世界进行更贴切描述的机会,影响了经济学研究的准确性与预见性。我们认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民族,也必将创造出包含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 价值文化对分工的影响

在研究此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定义进行简要的梳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所谓文化或文明,如在最为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考虑,则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

^①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金碚,2019:《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管理世界》第2期。

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能习得的其他能力或习惯的综合体。”^①按照她的定义,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后天习得的,由此可以推论,人类进行的一切改造自然的活动,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胡适则对文化进行了分类:文化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非自然的成果,可归纳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狭义文化,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它带有民族性,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②钱穆认为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以农、工、商各业关于物质经济方面为第一层次;以群体组织、家庭社会和国家为第二层次;以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为第三层次。^③许倬云则认为:文化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为一文化中成员思考的方式,二为一个文化中成员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方式及形态,三为一个文化中成员对自然环境采取的解释与态度,亦即思考方式、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关系三项。对上述定义进行分析可知,每位学者站在不同的视角会对文化给出不同的定义,泰勒的定义侧重文化的内涵,胡适的定义关注文化的类型,钱穆的定义关心文化的层次,许倬云的定义注重文化的层面,但所有的定义都试图在多样的文化氛围中进行合理的分类,使多元的文化变得简单和可把握,便于我们进行分析与研究。

关于文化对分工产生的影响,学者们也从理论与现实层面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认为: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的人,“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④这从学理上说明了,一种文化适应一种经济行为,并没有可以适应多种经济行为的文化模式,文化对经济行为是拥有专属性的。中国学者许倬云在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过程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在秦汉时期,中国已经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社会的雏形,并且这种文化对社会经济分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⑤秦汉在统一了的国家内设置了许多郡县治所,商贩们依托这些治所,将包括铁器、纺织品、工艺品等内地商品销往少数民族地区,并从少数民族地区带回牲畜、皮毛等商品,初步形成了当时的分工格局。在中华民族发展演进过程中,“江汉流域的南方文化和西方渭水流域的文化,融入中原的华夏,构成更广大地区的核心。这一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生态差别构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资源,实际上定下了后代地区经济和地区文化互动的基础。”^⑥这就是历史上文化影响分工的例证。

中西文化不同,对财富的各种认知也差别较大,最终会影响不同民族间的经济分工。按照基督教的财富观,西方人的财富观念就是:在有生之年尽量积聚财富,到你死去的时候,把它交还给上帝,让上帝替你分发给曾经被你剥夺过的人,帮你赎回原罪。这让西方人很容易理解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国人则具有完全不同的财富观,当我们逝去的时候,如果财富不能被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那么我们死不瞑目。^⑦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因,我们在工业化时代较难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华民族的工业化进程。而今进入信息

① 凌郁恒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马艳玲:《胡适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④ 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⑤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⑦ 李曦辉,2004:《民族文化对职业经理人行为模式的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化时代,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很容易就能实现不经由委托-代理关系,仅靠信息化平台就能实现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范围效益,从而使我国的网络型企业一举占领了全球该产业领域的制高点。这就是当代文化对分工影响的经验范例。

(二) 价值文化对经济活动规模范围的影响

价值文化除了对分工具有重要影响外,对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范围效益也具有较大影响。历史研究学者认为:“中国内部没分裂为若干独立国,其缘故一则在于文化的凝聚力,一则在全国性经济交换网继续的扩展,不断将全国吸入一个整合的经济结构。”“在空间的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成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链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①这样一种由于经济交往形成的文化接触与融合,是不断发展演进的,由于文化的不断认同,网络会越织越大,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效益也会越来越大。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一统,要求有新的观念意识,这样就必然会促使汉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发生日渐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一部中国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激荡、渗透、汇合、消融的历史。”^②这样的各文化交往、渗透、消融、融合,会越来越使各种文化出现融合,最终形成一个范围和涵盖人口越来越大的文化,为经济活动的规模范围效益提供文化支撑。其实,中华文化的凝聚作用早已有之。“秦汉中国能够熔铸为坚实的整体,乃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各项‘软实力’。在文化方面,在战国时代的基础上继长增高,中国有了完整的宇宙论、伦理学和价值观念,这些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家和其他各家综合的基础上。‘天下’观念具有弹性,可以不断地收揽和包容,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疆界。”^③这样收揽与包容的国家,在规模与范围方面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这深为外国学者所认同。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认为:“研究中国上古史,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其地理范围不大。中国历史并不起源于今日中国内散布的各点,再由这些据点发展合并成一个包括多源的共同文化。相反,中国历史的根源只在两个地区:一个是黄河流域中部的的主要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次要中心,后来,由这两个发展起来的文化相互解除影响……”^④现实形成了南北两种文化主导的两个中心,经过继续接触,形成了文化一统的中国。

纵观历史,中国自古就形成了包容一统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指导下,形成了规模范围不断扩大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的国家——中国。这种具有规模范围优势的国家最早已于秦汉时代形成端倪,随后不断发展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一文化力量的推动下,实现了大发展。这样一种依托文化实现经济活动规模范围效益的中国模式,也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

(三) 价值文化对创新的影响

关于价值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英国学者克里斯·弗里曼和罗克·苏特认为:“竞争优势的获得和保持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各国在经济结构、价值观念、文化、制度和历史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于它们在竞争中的取胜将起重要作用。”^⑤按照文化学者的定义,这些影响经济竞争力的环境因素,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也可以说,价值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一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来讲,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是它的分工程度,分工越细密,其增

①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祝启源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克里斯·弗里曼、罗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值也越大;二是它的创新程度,创新程度越高,新的生产函数引进的越多,生产过程的增值也越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主要依靠分工发展经济的国家。史书《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于公元前10世纪西征犬戎,就是从长安出发,经陇西、兰州、武威、张掖、居延海及巴丹吉林大漠,最远到葱岭、中亚一带,每到一处就以丝绸、铜器、贝币和朱砂馈赠各部落酋长,他们也以马、牛、羊、酒等物品回赠,就此打开了西北草原之路,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发端,也是中国关于全球化的探索。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打通了连接亚欧的丝绸之路。在此后近2000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一直是全线或区段畅通的,对中华民族形成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强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公元前119年开通,到13世纪宋代末期,丝绸之路一直是全线贯通的,在这一时间最早、范围最广的全球分工体系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大发展。可以说,迄今,中国是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国家。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它们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利益。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已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①如此,摆在西方人面前的就是一个两难的悖论,经济增长中容易的方法是依靠分工实现增值,然而,他们由于文化的冲突难以协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无法实现分工效益最大化;同时,世界是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西方人又要迎接激烈的竞争,没有办法,他们只能选择或然性更大的方法即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在发展风险方面要远大于分工的方法。分析结果明确告诉我们,民族文化对创新的影响是巨大的,值得我们未来认真研究。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独特的经济学范式

按照学者对文化进行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后天习得经验的凝结,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共同的世界观和行动准则,它于无形中指引人的行为。可以说,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会塑造出迥异的文化,并使不同群体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如果进行经济活动,就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西方人推崇经济人假设,强调个体理性;中国人坚持多元共生理念,强调集体理性。这种文化特征反映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就是西方诞生了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微观—宏观理论,中国采用方枘圆凿的方式试图适应西方经济学理论,但是结果总是差强人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完全相容,体现为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矛盾。西方文化主要产生于商业文明与海洋文明,这种文明依托的物质基础,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试想,古代社会的商业活动需要人们的集体行动吗?同时代的远洋运输需要大规模的船队吗?这在当时都是不需要的,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任何商品的产出都不会有很大的规模,如果商家众多,反倒会形成恶性竞争,不利于商人的获利。当时的商人是单打独斗的。当时的造船水平也是比较低下的,商船既没有导航系统,也没有燃料动力,而是仅凭风力实现远航目标,而且风险极大,如果众多商船拥挤在一起,反而增加了碰撞的危险。当时的远洋航行也是帆船单独进行的。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特征,使得西方人养成了个人主义的性格,在经济活动中更加关注自身的行为与利益,并不过多考虑其他人的诉求。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性格,使得西方人不注重从群体角度协调不同个人之间的行为,也就是不需要张扬群体文化,因为他们不需要大隐于无形的民族文化来整合群体成员的行为,也不需要大家的共同行动来增进经济效益。中国则不然,在古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社会,我们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工作就是兴修水利基础设施,这就需要许多人共同完成,可以说,我们自人类文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明社会发端起,就形成了群体成员的集体主义特征,每个人都离不开群体,群体的发展会给其中的任何人带来福利。这样的群体文化特征,要求社会必须协调成员的行动,这其中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这种文化行为反映在经济理论上,那就需要有描述文化的理论加入其中。所以说,我们在尊重经济理性的基础上,要加入价值文化以及建立在价值文化之上的制度形态,这时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微观—宏观—域观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才能让经济学理论更接近社会发展现实。

和合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学*

陆 铭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和转型中大国,它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面对既有经济学理论、大国发展实践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既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又能够为人类共同的一些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方案,还能够增进在全球文明多元互鉴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贡献。

关于文化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最近有一篇非常重要的完整的研究总结,^①同时,李辉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经世之用、革故鼎新和情理交融是中国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文化的三大基因,是与市场经济相融的。^②在此基础上,我仅就和合文化与中国经济(学)的关系,以及有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做一些进一步的阐述。

一、经济学和经济的难题

现代经济学理论是建立于分散的个体决策及相应的市场交易和契约制度基础之上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说明,市场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资源的结果并不能达到一级最优(first best)。即使通过机制设计来优化资源配置,也只能达到次级最优(second best)。经济学理论还探讨了很多在正式契约之下资源配置有可能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例如无限次重复博弈可能得到合作解,又例如声誉机制,等等。

然而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优化配置的合作解在现实中却往往遇到巨大的困难。例如,个人是短视的,这使得人天然有行为短期化的可能性。除了人天然的短视之外,还有一些现实情况会加强行为的短期化和非合作行为的产生。例如,在人口流动性特别强的发展阶段,一个人在特定地方生活的时间不长,因而有可能在人际交往中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再比如,地方行政长官的任期不长也有可能会导致政府行为的短期化。人口流动和地方行政长官的任期较短相叠加,有可能导致一些投资回收期较长且具有跨地区正外部性的公共品投入不足,尤其是流动人口及其

*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邮政编码:200030。作者感谢李辉文和王丹利提供的建议和补充。

① Sara Lowes, 2022, "Culture in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30511, <http://www.nber.org/papers/w30511>。

② 陆铭、杨汝岱等:《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后文简称《大国经济学》,且出版信息相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子女的教育。

除了国内事务有可能会分散决策之下的非最优结果之外,在国际事务中,由于非合作行为所导致的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国家间如何在气候变化、国家安全、产业链分工、维持和平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现状也始终是不尽如人意的。

在遇到上述问题时,协调机制就变得尤其重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协调机制是在基层社会发挥作用的,宗族的角色非常重要。但在古代中国,尤其明朝之后,宗族被作为专制集权深入基层的治理工具。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这种农业社会时期的治理机制已经被现代化进程和人口大范围流动所瓦解,构建及完善市场机制与法制体系成为更合适的选择。^①

在当代中国治理中,中央层面的协调机制在很多跨地区的重大事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又例如大运河申遗、长江流域的综合治理和跨地区的污染防治,这些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协调,都很难办成。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城市群的作用,也同样涉及跨省和跨市的协调问题。例如,长三角一体化正在碰到传统体制下按省和市的辖区进行规划管理和资源配置的体制障碍,跨省协调机制虽然逐步建立起来,但仍有很多难题有待攻坚,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以市为单位的国土空间规划制约了一体化的都市圈建设。^②当然,协调机制要起到良性的作用,本身应以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和多元诉求的包容性为前提。

二、中华和合文化

无论是市场机制下的契约和法律,还是行政协调机制,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协调机制对于处理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显然是重要的。而文化则能够成为协调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基础,使得相关主体能够相信最终协调的结果,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与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协调作用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③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④和合并不是否定矛盾、冲突和差异,而是认为通过协调、合作、包容可以找到多方共赢的方案。和合与多元是一体两面,和合包容是内在精神,多元一体是外在表现。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和合文化。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的弟子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也提倡人和,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孔子提出“和而不同”,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国与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秦汉以来,世俗文化各家、各种宗教文化、甚至宗教文化与世俗儒家文化之间也讲和合。各种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相互融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衍和发展。

当代学者也对和合文化有诸多提倡。例如,钱穆说:“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⑤张岱年说:“许多不同的事物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谓之和,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⑥汤一介认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争取“和平共处”,必须实现“共同发

① 王丹利,2023:《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顺应、阻碍与变迁》,《学术月刊》第3期。

② 陆铭:《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力、宜居与和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③ 张立文,1998:《儒家和合文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学习与探索》第2期。

④ 张立文,1995:《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21世纪》,《学术月刊》第9期。

⑤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

⑥ 张岱年,1997:《漫谈和合》,《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展”。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关系,要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和谐”观念的资源。

和合文化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及当今思想家的表述当中,也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治理实践当中。和合策略是在多方势力均衡的情况下,给各方势力或者一个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一个选择。王导、王阳明等中国古代政治家都有过“和合”的治国理念的表述。比如东晋王导提出“绥抚新旧”(《资治通鉴》),明代王阳明提出“协合乡民”(《南赣乡约》)。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古代史中,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合策略是有局限性的,它所达到的结果并不是现代社会中人民福祉的最大化。

人类共同发展目标是追求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但市场经济本身和中国转型期的一些体制并不能自动实现这些目标,而和合文化有利于促成人类发展目标的实现。随着中国对于国内高质量发展的追求,和对于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和合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发挥出它新的生命力:第一,和合文化与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所追求的和平、公平和正义相一致。第二,和合文化与中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相一致。第三,在国家治理方面,它与中国的共同体意识相一致。为了做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要厘清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李辉文认为,文化对应着不同民族的个性,是使不同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的因素,而文明则对应着各民族发展趋势的共性,推动着各民族之间趋同的因素;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但无所谓高下和优劣,而文明则存在着进步和退步的概念。因此,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对应的是“转型”,而文明对应的是“进步”。^①

在实践上,和合文化可以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发挥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对内有利于推动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各方的利益共赢。市场竞争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导致地区间、群体间和个人间的利益矛盾,和合文化可以与正式的法律和契约制度相互补充,使市场经济得到良性的发展。举例来说,在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很大,而劳动力流动使得地区间人均 GDP 趋同的作用又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因此,在中央协调之下进行的地区间结对帮扶就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②“省际合作帮扶”对边疆民族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③

第二,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利于提倡文明的互鉴,反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从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自美国“9·11”事件以来,又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民族主义抬头,国际纠纷增加,地区冲突频现,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思想理论的指导,有利于人类文明从冲突走向互鉴。和合文化还有利于获得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的广泛认同,既有利于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差异,又能够以“和”来增进中华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大团结。

三、和合文化的适用性与经济学一般性

和合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是兼容的。和合文化并不排除市场机制下个体的理性决策,

^① 《大国经济学》。

^② 唐盟、陆铭,2023:《协作发展:结对帮扶对劳动力流动和共同富裕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工作论文。

^③ 徐明,2023:《中国省际合作帮扶政策的经济效应——对21世纪“19省市对口援疆大型区域扶贫项目”的评估》,《经济学(季刊)》第3期。

但它也的确面临着个体的分散决策对于合作解造成的负面影响。问题在于即便在个体分散决策基础上,可以借由机制设计达成合作解,在执行层面仍然需要有机制设计的主体,同时也要有共同体意识作为前提条件,而不是说喊和合文化的口号就可以化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合作问题。

和合文化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但合作机制却非中国独有,弘扬传统文化要避免唯我独尊。在有些问题上,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协调机制,甚至于比中国做得更早,比如跨区域(甚至跨国)发展的协调机制,都市圈跨行政单位的规划,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经验。在文化相关的理论上,和合包容的文明具有普世性,西方文化虽然更重个人主义,但并非完全忽视和谐。例如,面对一度流行的“文明的冲突”论,诺贝尔奖得主森提出,不应以单一身份划分人,并进而形成不同身份人群之间的冲突。^①

在肯定和合文化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和合文化有可能导致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群体合作和谐的强调,可能会导致个体层面的激励不足,甚至导致个体权益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要重视对为集体利益而牺牲的个体利益的补偿。第二,如果和合文化的强调仅仅是为了减少社会矛盾而不顾资源配置的效率,非常容易产生个体层面的搭便车和卸责行为。从长期来看,这会使社会群体的预期发生变化,反而有可能不利于合作出现。即便短期内有可能出现合作解,也可能最终让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群的不负责任行为而“买单”,造成结果的不公平。例如,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金融机构代发了很多由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理财产品,而且人们在购买的时候是被告知有风险的,但人们仍然相信政府背书的理财产品不会有风险。事后,如果这些理财产品对应的项目回报低,最终无法兑付,很多人仍然会找政府。如果此时政府为了稳定,用财政收入来兜底,实际上就是用公共财政为不负责的个体行为和低效率的政府投资“买单”,这事实上对社会中对自己负责的群体是不公平的。

在实践层面,和合文化和相应的协调机制本身也要有自己的边界,文化只能作为润滑剂,使市场和政府更好地发挥它们的功能,而不能用文化来模糊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如果面临社会矛盾,政府试图依托和合文化作为化解矛盾之道,反而有可能导致正式制度中的不合作。例如,在地区间关系方面,中国社会总是在试图避免经济活动和相应的税收向优势地区集聚,甚至曾经在建设用地的分配方面向欠发达地区和小城市倾斜,这似乎可以让地区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但结果却导致每个地方都更要最大化本地的经济规模和税收,反而不利于要素跨地区流动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②

对于中国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挑战和问题,要区分其不同的性质,使得和合文化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有一些问题确实是市场经济自身很难解决的,需要基于和合文化的协调机制去寻找解决方案。例如,跨地区的公共品提供、污染防治等,这些方面中国做得比较好。第二种问题是中国自己从计划经济时期传承下来的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此类问题不是通过文化或者协调机制就能够解决的,而需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对于权力寻租问题,不能以和合文化回避矛盾,而要减少行政权力对于资源配置的不当干预。再例如,在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中,要在文化上提倡,更要在制度上加强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但是,中国存在的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问题,与金融抑制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有关,^③这不是文化上的提倡可以改变的。第三种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新问题,比如说数

^①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③} 《大国经济学》。

字经济、科技进步、气候变化等领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以更合理高效的全球治理,实现和平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这方面,和合文化可以在全球治理中发扬光大。

四、结 语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本文试图从和合文化的角度去阐述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必须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当代中国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吸取,就能够自动地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厘清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关联只是重要的一步,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方面齐头并进。

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史晋川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区域经济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区域平衡发展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沿海优先发展,直至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不断变化和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也从以主要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到现代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和空间经济理论,逐步进入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立的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与分散及背后的技术和制度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有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认识,为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本土化资源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紧密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借鉴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吸收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刻画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对经济空间演变的历史进程,揭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技术和制度三者互动的内在机理,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影响及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出发,研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对地理空间的依赖和影响,以及相应的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演变,形成了一系列技术和制度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洞见,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邮政编码:315500。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来看,资源配置活动一方面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地理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是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民营化和市场化。前者是经济发展,后者就是制度变迁,两者的关系反映出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因此,区域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可以基于社会经济活动活动中的自然、技术和制度三者相互作用关系这样一条研究主线来展开。从自然、技术和制度三者的互动关系这一主线来研究区域经济学时,生产力是指社会成员在共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而技术就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生产关系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分工关系、产出的分配关系等,而生产关系同样是制度中最重要的因素。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的视角阐述了自然、技术和制度三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地理环境的特征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

区域经济学在研究自然、技术和制度三者关系及相互作用时,可以从先天性因素和后天性因素不同的视角,把地理空间划为极少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技术、制度影响的自然地理空间和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技术、制度等因素影响后的经济地理空间,区域经济学研究重点是在自然地理空间的约束下,技术和制度这些能动的因素变化对经济地理空间形成的作用机制。从历史来看,在技术和制度比较落后的时期,自然地理空间对经济地理空间形成的影响较大。但在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制度极大地突破了自然地理空间对经济地理空间形成的约束,由此造成了经济地理空间与自然地理空间的差异性扩大和多样性增加。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将密度、距离和分割作为研究区域经济的三个基本维度,分析了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通过改革来打破制度障碍: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来缩短距离、以完善制度来减少分割,加快生产要素与信息在空间流动,集聚要素,提高经济密度。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对地理空间的依赖和影响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洞察到自然、技术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要同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实际紧密结合,以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自身独特的地理条件,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近一百多年来,又经历了多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变迁,在自然、技术与制度三个方面,与发达国家也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本土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的计划来主导和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由此决定了国家的产业布局及经济空间的演变。改革开放时期,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乃至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对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同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按照自然、技术和制度三者互动这条主线,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区域经济学在制

度研究方面,必须重点研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这一中国特色的制度及其对技术和经济空间形成和变化的作用。

新时期的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面临新的国际政经环境,新的制度安排、新的技术冲击和新的空间结构。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应该以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加快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突破创新,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撑。(1)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推进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变化,产业空间布局 and 区域经济格局加速调整。中国区域经济学要围绕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生产力的互动及国内外生产关系的调整,探索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经济理论创新。(2)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改变了要素空间流动的成本与收益对比,影响区域要素分布、流动与组合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等。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要揭示数字时代下的要素空间流动与集聚的规律,创新数字时代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3)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集聚和承载经济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使得区域空间结构的网络化和流动性特征愈加突出。中国的区域经济学要围绕城市及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及其内在机理,创新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目标将改变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空间规划体系和区域政策体系的评价标准与维度。中国区域经济学要围绕空间效率与空间公平关系,拓展区域经济管理和区域政策研究,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自然、技术与制度三者互动关系。经济学者要紧紧密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以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三、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来推动区域经济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只有通过结合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区域的划分、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域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历史学和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区域发展思想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最早包含地理及区域经济论述内容的著作有《山海经》和《禹贡》,后者依据自然、经济、交通等不同条件,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划分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后来就有了“茫茫九有(州),区域以分”的说法,从自然、行政、经济、文化等方面来研究不同的地理空间。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编纂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区域地理的著作,记述和分析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人类生活即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特征,把全国划分为五大经济区。此外,《管子》的经济思想中也有城乡产业布局的论述,论及城市与城郊地区(所谓“国”)和农村地区(所谓“鄙”)的农工商不同产业分布,主张要优先发展农业,围绕农业来适度发展工商业。桑弘羊基于不同地域出产不同物品的认识所提出的“本末并利”的重商主张,也包含着区域经济分工与贸易的思想。这些中国古代的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阐述了中国历史中自然地理空间对经济地理空间形

成和演变的影响,使得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来研究中国特色的自然、技术与制度三者互动关系,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来深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是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中国古代区域发展思想中也包含着许多区域可持续发展思想。荀子特别注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重视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把保护自然资源视作安邦之策。管子在主张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出了“地利不可竭”,要保护自然资源,防止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滥用,否则的话会造成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带来各种自然灾害,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地、天、道、自然是一个整体,阐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国古代区域发展思想中的这些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有助于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突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通过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推动区域经济研究的理论创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科学地借鉴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构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内在统一的学科研究框架,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证经验研究,讲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故事,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提炼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验,创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模式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杨瑞龙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既不是细枝末节的改革,它从根本性上否定以等级规则协调资源配置的计划体制,转向以产权规则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它也不是改旗易帜的改革,我们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体制模式,那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而且也孕育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体

*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

制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能够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相互契合性。

首先,逻辑起点的契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为普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无产阶级若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联合起来,推翻以私有制为基石的资本主义制度。据此,《共产党宣言》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土地自然本身并无价值,只是有了人类,天地自然才有了价值,因此,王阳明主张“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也就是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仁者,爱人,孔子倡导仁政“以人为本”。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思想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民为邦本,注重人的尊严、价值和发展,强调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这些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相通的。

其次,价值观的契合。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劳动从属于资本。无产者若要获得解放,建立起“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全新社会,无法通过个体的活动得到实现,只能依赖于阶级的整体行动即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奉行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每个个体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当阶级的利益实现后,作为无产者个体的利益也就自然得到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时代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为人民服务 and 爱国主义精神之中,在经济领域体现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最高社会信仰。这里的“道”就是作为儒家价值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道德的核心理念就是重义轻利,也就是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应奉行“至德之世,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坚持“先公后私”“先义后利”。从孔子在《礼记·礼运》大声疾呼“天下为公”,到宋儒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康有为提出的“天下大同”、孙中山把“天下为公”作为最高宗旨,再到我党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化与价值的内在基因具有契合性。

再次,发展观的契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作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研讨生产力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导致了人与自然的日渐异化,对自然资源的抢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必然要求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生产方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万物,人在其中,即人类源于天地自然,生命一旦产生就有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人类在实行天地之道时,就必须积极进取,锐意创新,自强不息就构成中华民族的特质,同时要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之责任,承担起对天地万物之责任。古人把天、地、人看成是决定生产发展的三大要素,天地人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具体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和”就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历史的和谐。^①人道源于天道,人类的活动要符合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德经也有类似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① 高德步:《中国价值的革命》,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自然。

最后,变革观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就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这时唯有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才能解放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我国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变革思想,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与增进人民福祉;改革方向就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之道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易传·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天地之道为仁,此道具有盛德大业,而盛德大业的含义就是富有日新。也就是说,只有合乎道义的创新、富有日新,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发展。^②古人非常强调只有不断去除积弊,才能持续地焕发生机。革故鼎新出自《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指破旧立新。古人把革故鼎新作为执政的一个原则,“御政之首,鼎新革故。”执政者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推行新猷,革除陈规陋习,不能因循守旧。《吕氏易说》卷下中也有类似说法,“必有信下之志而后改上之命,则命无不行,而革故鼎新之治成矣。”马克思主义的改变世界思想与“革故鼎新”思想具有契合性。

相互契合不等于完全相同,而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基本逻辑具有相似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中国化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性,使得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相互融合、互相成就,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市场化改革中互相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协调。所谓正式制度是指正式颁布的旨在约束每个当事人行为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及具体的规章制度;所谓非正式制度就是指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它对人的行为尽管没有强制性,但当事人基于对特定价值的认同会自觉地遵循这些非正式规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制度上就体现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在经济制度上就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上正式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能保证我国始终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显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发展观、“革故鼎新”的变革观等相契合,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会通过意识形态、习俗、习惯等伦理道德来影响与规范人的行为,从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正义性。在市场化改革中,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以及互相融合和互相成就,使得我国充满活力的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计划体制排除物质利益刺激,“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市场化改革通过产权制度与价格机制的改革,不仅承认市场主体追求个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高德步:《中国价值的革命》,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利益的合法性,而且通过明确利益边界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从你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导致了财富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复制西方的市场制度,而是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具体来说,就是党领导下的政府代理人民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无论是党的宗旨还是公有资产的性质都决定了客观存在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市场化改革与经济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促进共同富裕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价值观相契合。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与个人利益的边界来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也可以在生产与分配中贯穿公平正义原则,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

第二,竞争与合作的运行机制。市场化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命令服从的资源配置方式,引入了市场竞争。竞争的前提是承认与保护市场主体在不损害其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与行为,竞争的方式主要分为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所谓价格竞争是指在商品具备同样品质条件下通过调整价格获得竞争优势,所谓非价格竞争是指在同样价格条件下通过提高商品的品质来获得竞争优势。如果市场是完美的,竞争是充分的,那么市场机制将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但事实上,市场是不完美的,竞争也是不充分的,市场交易中广泛存在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市场失灵在所难免,从而不仅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也是必要的。所谓合作是指个人与个人、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彼此配合的一种行为模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很难构建一个基于共同目的的合作模式。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同时也可以同时构建基于共同目的的合作机制。建立在公有制为主基础上的共同目的可以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形成合作机制。在微观层面,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追求更高效益的同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国有企业不仅追求利润目标,还要追求某些社会目标,如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维护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等。在宏观层面,政府通过经济社会等政策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竞争与合作运行机制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亲仁善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所谓决定性作用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消费品、生产资料、资本、劳动、技术、土地、数据等的配置都要遵循价值规律。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的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全面转型中的国家,更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不仅要在宏观调控上发挥积极作用,还要在制度层面、改革层面、产业与地区发展层面及某些特定的微观层面(如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维护市场秩序等目标,对微观主体实施必要的行政干预等)发挥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就需要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推动政府职能转换,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与方式,优化新型政商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间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仁政等的为政之道相兼容。

第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此,我国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释放经济活力,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断厚植

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我们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我们追求的根本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物质富足的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富有的精神文明,为此就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物质上更大程度的富足有助于民众遵循集体主义价值观及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创造更好的社会与舆论环境,减少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从而使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五,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机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增长一般指更大的财富增加,它通常用人均GDP或者人均GNP来表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也包括收入、教育等均等化程度、经济结构是否优化、自然生态环境等状况,特别是财富的创造过程也是自然资源消耗的过程,它可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的外部效应。如果经济增长导致对自然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那么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如何解读中国模式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显然我们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到现成答案,更不可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我们正确的思考方向,那就是“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所谓中国道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而基于中国经验所形成的中国经济理论就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理论的创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环节:一是要通过读经典,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立足中国实际,发现科学问题。普尔认为,科学问题就是“背景知识中固有的预期与其所提出的观察或某种假说等新发现之间的冲突”。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用中国道理回答这些科学问题,提炼与总结出规律性认识。四是基于规律性认识,提炼出中国经济学的特有概念与范畴。五是梳理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包括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

以“两个结合”自主推动现代经济学理论创新*

张 军

一、引 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

*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

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又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阐释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经济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坚持“两个结合”,加快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创新步伐和更自主地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对于拓展和丰富经济学现有的知识体系必不可少,也是中国经济学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在时空上压缩了西方世界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也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站到了历史上最接近全面伟大复兴的时刻。之所以称为“奇迹”,不单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之快和时间之久“世所罕见”,更是因为其实现方式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推测和叙事方式。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伴随着“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而前进的。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样的现象,以一种自觉的方式来构建以中国为衣钵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体系,不仅可能对中国经验现象与西方主流理论的巨大反差给出科学解释,克服主流经济理论缺乏唯物史观、缺乏价值关照、过度数学化、陷入机械论窠臼的本质缺陷,而且通过设立与中国经济重大问题密切相关、体现中国悠久国家历史、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重大研究议题,可以大大拓展现有西方经济学两百年积累起来的知识与理论分析的范围,同时不断强化我们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必将给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坚守“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适逢其势。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个艰巨浩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坚持和付出。对中国经济学人来说,现在到了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关于中国经济和经济学的议题的时候了。

二、什么是我们重要的议题?

建立我们自主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体系,拓展当前经济学知识体系及其范围,需要纳入那些能更好反映西方以外,特别是能反映中国和东方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的重要议题。就中国和东亚地区而言,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国家类型、精英政治以及儒家文化传统的来源。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家形成、官僚体系和政治秩序乃至治国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文化和制度遗产,对东亚儒家文化圈和更大范围里的民族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遗产应该成为拓展当前经济学知识体系及其范围和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议题。

到目前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涉及的几乎全部重大议题都是基于西方世界,特别是近代欧洲崛起的历史现象。这个历史现象催生了一系列主要的议题并被几代经济学家继承和发扬光大。西方经济学从最古典的阶段开始,经过英国工业革命的洗礼之后,再到19世纪欧洲经济的崛起与海外扩张,经济学的研究始终围绕以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代表的重要议题。

从18世纪以来到20世纪初,除了马克思以外,对这些议题的最重要集大成者包括了斯密、穆勒、李嘉图、边际革命的推动者(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以及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伦敦经济学院

的罗宾斯等。这些重要议题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美国“剑桥”的一批经济学家(特别是MIT的萨缪尔森、索洛等)的综合与系统化,形成了流行至今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

简单地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议题大概可以用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来概括。根据“第一定理”,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由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所形成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第二定理”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只需一次性总赋税(大致上可以理解为界定清楚初始的产权),市场机制这个无形之手就可以实施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因而政府只需担当“守夜人”的角色,无须参与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

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就围绕这两个定理而展开,并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不考虑国家历史传统和制度、文化存在持久差异的情况下直接应用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收入分配、金融、国际经济关系等诸多领域,也自觉不自觉地以近代欧洲的经济崛起现象和西方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作为标准和模板。这个建立在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逻辑之上的理论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看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道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国家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不用说现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在理解诸如东亚式发展型政党及其巨型组织内的激励机制的演进,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效能与市场效率的关系、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政治秩序演进路径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持久性等等这些重大现象上的苍白。

所以,主流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不仅在视野上过于局限,而且在议题上过于单一。由此形成的“一般原理”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包容性的“局部知识”。而从范式竞争的角度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需要能够容纳,而且需要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既有议题设定。这种超越性的集中体现就是需要容纳比欧洲崛起早1500年的中华文明和国家传统。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所形成和演化出来的大一统国家体制、精英官僚政治、意识形态和治国能力及在经济社会演进中孕育的诸多重大议题。这些重大议题不但可以大大拓展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议题的广度与深度,也可以充分彰显基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学范式的包容性和广阔性。

不可否认,过去三百年,在欧洲也出现过不同于以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经济思潮,如法国重农学派、奥地利学派、德国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继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但这些重要的思想都没有真正成为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从学科范式的角度看,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分析范式都缺乏足够的“实证性”,进而难以进行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累积创新”。

同时,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国内也不乏几代学者延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艰苦的思辨式的探索,提出了诸多富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经济术语和理论概念,这无疑是帮助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但同样从范式竞争的视角来看,这些研究也因为缺乏足够的“实证性”,难以进行跨国家、跨制度、跨文化交流,最终也无法融入并主导全球话语体系。

概言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需要增加“实证性”,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体系则需要增加“中国议题”。因此,议题设置和遵循实证性的研究范式将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则,其中将“国家”回归到经济分析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回避的选择。

三、将“国家”回归到经济分析的中心地位

国家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将国家回归到经济学的中心地位,

不仅具有回归到经济思想形成中的早期传统,更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需要把分析范围从现有的“局部知识”中拓展出去,登高望远,看到更丰富、更多样和更真实的世界。

以发展经济学为例,西方现有的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总体上是“第一原理”和“第二原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简单应用。他们习惯于视国家为外生的因素,或者隐含地给定了国家能力、国家能效以及官僚体系的效率都是不变的。但正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所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国家能力孱弱、官僚机构臃肿腐败、缺乏稳定和可预测的秩序与政策环境,这些常常成为经济发展中最致命的障碍。而中国和东亚地区能够借助于追赶战略实现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跟它们历史上受到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国家和精英政治的传统密不可分。国家有能力维护政治秩序和稳定,推行国内改革,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与战略,维护市场竞争和金融稳定,这些乃是经济发展的一阶条件。所以,关于经济发展的答案不可能在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框架里得到。经济发展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在这里,因为国家和政治都是内生的,于是我们就完全可以扩大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深化对国家这个巨型组织的效率及其团队治理能力的研究,对精英政治质量、官僚机构与经济组织的关系、对政治秩序的不同起源及其经济影响的研究,如此等等。我们对这些重要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我们若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贡献,就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来。

再比如,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中有一个常常被经济学家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国家的战略性规划对长期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这些战略规划领域除了像人才培养、医疗健康和扶贫之外,还包括土地、基础设施、电网、通信网络、装备制造、水土保持、治水治沙、水库大坝、南水北调等等。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条件之一,也是成功的结果。其实,西方崛起的历史和东亚高成长经济体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国家的这些战略性规划和投资活动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只是这些活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程度、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范围罢了。但是,由于这些规划领域的特殊性,尽管需要巨大的投入,却没有即时的产出或因为不进入市场交易而无法估计产出规模。其结果,这些对经济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家活动及其“推断收入”却并不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和分析范围之内,甚至当主流经济学家批评中国和东亚的投资效率不高和资本错配时,全然忽略了国家的这些战略性支出活动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重要经济活动的隐含产出很可能在任何国家的经济产出总值中都占有不可忽略的比重,但却不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之内。可见,以国家为中心扩展现有经济分析的范围对于我们理解真实的经济世界和看到不同经济模式的演变道路是多么重要。

四、在经济理论创新中保持文化自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无为而治、反者道之动等光辉经典思想,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深刻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而且也具有取之不竭的经济学内涵。“半部论语治天下”,“无为而无不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等等。在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系统深入地汲取和掌握《论语》《道德经》《管子》等中华经典的思想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养料,不但能够为理论创新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素材,也可以为树立“四个自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更是应该放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70多年的新中国国家建设和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这个思想史

跟中共党史、新中国建设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密切相关。给定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以来最成功也最具影响力的“创业团队”，创业史中自然呈现出许多值得研究和理论解释的重要现象与规律，对“四史”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将各种重大战略选择、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等等融会贯通到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但是必要的，也将极大地丰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结构并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拥有的有关国家历史和治国的数据库还太少，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建设出一批重要的数据库来，助推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建立起围绕治国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的历史数据库，就可以推进我们对国家制度、国家能力、官僚制度、贤能政治、天下观、政绩观等重要基础性制度的变迁和特征、探索其相关因素、因果关系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文明和国家传统源远流长，为我们构建社会科学原创性研究活动的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需要我们一两代人倍加努力。如以治国为主题，我们就可以至少推动以下三个层面的数据库建设：

第一层面，建立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历史数据库。将基于前现代3000余本地方志，搜集并建立郡县制在各地区最早实施及后续变迁时间面板数据库。

第二层面，建立前现代中国官僚制度数据库。这一数据库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基于《二十四史》建立起秦汉至明代的官员信息数据库。《二十四史》通常由本纪、列传、志书与表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列传记载了历朝主要官员的生平事迹。我们将对中列传主传所记载的8660名官员进行数据构建，具体而言，拟建立包含官员姓名、籍贯、入仕途径、为官经历及死亡情况的数据集，结合《历代职官品位表》（吕宗力，2015）将官员官阶进行对应。第二部分基于《明代职官年表》（张德信，2009）、《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1980）及《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等，1995）中官员名录建立三个时期省级以上官员面板数据库。该数据完成后将包含明清15783名（明：7929，清：7854）从三品以上及民国省级及以上官职及官员名录。结合中国历史人口、分省举人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和谢沛霖，1980）中的进士数据分别计算明清两代政治精英选拔与流动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

第三层面，建立明清社会经济指标数据库。明清时期是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关键时期，故拟建立明代以来府级社会经济指标的面板与时间序列数据，具体包括：技术进步、人口与经济增长、粮食种类与价格、地理、气候、天象及冲突。

五、结 论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活动进入新的阶段，一批高水平的优秀成果不断涌现，海内外中国经济学人为经济学文献和现有知识体系的拓展与丰富正在做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贡献。现在中国经济学人每年在国际国内的重要期刊发表的高水平研究论文持续增长，也在西方同行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崛起和对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学的议题和发展轨迹。21世纪必将是中国重返世界中心和迎来中国伟大复兴的世纪。从现在起，只要我们坚持“两个结合”，不断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与当代的重大现象中寻找重要的议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完全可以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拓展和丰富经济学的分析范围和知识体系做出我们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并以此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荆 岩）（校对：清 泉）